



回忆对比

征文选

第二集

作者：佚名

上海人民

社

WWW.DUOXIU.COM

回忆对比征文选
第二集

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2 插页 2 字数 61,000

1966年4月第1版 196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3074·438 定价：(五) 0.26 元

封面设计：任意

編者的話

本报自一九六三年創办的《回忆对比》征文，到今年五月底为止，已出到一百十三期；已經出版的《回忆对比征文选》一书，发行了五十多万册。这些征文，由于紧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到了广大讀者欢迎，許多征文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許多讀者要求我們將《回忆对比》征文繼續編成小册子出版，我們接受讀者的建議，从已經发表的《回忆对比》征文中，再選擇了比較有代表性、在群众中影响較大的十二篇文章，編成《回忆对比征文选》第二集，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一集的文章，絕大部分是揭露旧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罪惡的。这些文章的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资产阶级怎样为了掠取最大的利潤而残酷地剝削工人，怎样用工人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这些文章用活生生的事实說明，资产阶级的一部发家史，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血泪史。請看解放前的二十年中，老正和染厂的老板从一个光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而在同一个時間，单无償地被他剝削五

年而被开除的学徒就有八百多人；永福源五金厂老板雇用的一百五十个工人中有一百二十多个童工，这些童工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干活，干一个月只拿到能理一次发的“月规钿”。有些资本家宣扬什么“勤俭起家”，但这些文章有力地揭露了这个谎言。只要是资产阶级，他们总是靠剥削工人起家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的所谓“勤俭起家”，是掩盖资本主义罪恶本质的一个幌子。

“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懂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就不懂得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果不懂得资本主义剥削，就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有助于我们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界线。读了这些文章，能够激发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热爱，帮助人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回忆对比》征文举办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这个专栏仍然是广大读者最喜欢的栏目之一，这说明《回忆对比》是在革命人民内部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有效的方法，是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我们一定把这个专栏继续办下去，并

且希望广大群众不断地给它提供新的题目和新的材料，给这个群众性的阶级教育阵地注入新的活力。“温故而知新”，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群众需要从《回忆对比》材料中汲取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需要从《回忆对比》的材料中来培养自己的阶级感情，增进阶级意识，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识别和批判能力，使自己永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日报编辑部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統一書號：3074 · 438

定 價：0.26 元

目 录

- | | |
|--------------------|-------------|
| 揭开“老正和”这块金字招牌····· | 徐雪林(1) |
| “药老虎”发家史····· | 张文显(12) |
| 童工血泪····· | 施灿荣(24) |
| 在“40000”的后面····· | 黄玉成(38) |
| 道德油厂老板的“道德”····· | 周荣隆(49) |
| 四十年和十四年····· | 蔡金龙(56) |
| 两代码头工人····· | 徐锦万(66) |
| 党帮我革掉了“黄莲命”····· | 王小妹(74) |
| 从工人的手看两个社会····· | 王福元、王存柏(81) |
| 两个社会制度 两种店员生活····· | 盛祥云(91) |
| 磨豆腐的苦和甜····· | 缪金龙(100) |
| “万人坑”里逃生····· | 赵扬全(105) |

揭开“老正和”这块金字招牌

老正和染綢厂老工人 徐雪林

旧社会，在上海滩，很多人晓得老正和染厂。可是在这块“金字招牌”上，不知沾染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姜太公”如此钓鱼

“老正和”老板是怎样的人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初到上海时，随身带的只有一只破包袱，经他姐夫介绍进厂当了“跑街”，学得一套剥削“门檻”，后来当了“老正和”的老板。不过二十年上下，“老正和”的资本扩充到一百多万银元，他变成了“百万富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老板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一九二四年，德帝国主义在上海倾销染料，许多染店老板放弃加染业务，从事染料买卖，从中获利。这个老板的算盘打得更精明，他认为染坊可以“大展宏图”。于是，他凑了一笔钱，先来个虚张声势，大做广告，欺骗顾客。他在杭州城隍

山、临平山选了两处面向铁路的山地，用铅皮做了几个象房子那么大的字——“上海老正和染厂”，居高临下，使人在几里路以外都看得见，特别是坐火车南来北往的旅客，经过这个地方，非常触目地看到这几个大字。这块大广告，当时轰动了沪杭线，为老板招徕了不少生意。他又在温州设立加染业务收发站，在温州接些零星生意，送到上海“老正和”来加染（后来在温州开了分店）。老板就这样拉住了外帮很大一批生意。

老板做广告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除了做“大广告”以外，还买通同乡、上海流氓头子之一王文奎，由王拉关系，与黄金荣大流氓等结为“十兄弟”。他利用流氓的势力，在当时的荣记大世界、黄金大戏院、共舞台、城隍庙九曲桥等地大做广告。他还经常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台大吹牛皮。

“老正和”老板挖空心思做广告，结果使加染生意扩大无数倍，特别扩大了门市业务。过去一年门市只有二千笔生意，大做广告以后，最高峰的一年超过二十五万笔生意，增长了一百二十多倍！

老板做广告的钱完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老正和”染一件东西，价格要比一般染店高三成。但他又摆了个噱头：顾客每染一样东西，奉送一只精致的纸盒，盒内装有“老正和”一张商标——“姜太公钓鱼图”——愿者上钩。“老正

和”老板就是这样靠广告釣“鱼”的!

“預約券”的秘密

老板做广告打响了“老正和”这块招牌，门庭若市。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騙錢的办法——发放“預約券”，騙取顾客的錢財。

“預約券”是什么东西？它是一张张紙印的三元五角的票券。顾客买了这种“預約券”到“老正和”染东西，表面看来，一张票券可抵五元使用，其实因为利潤率极高，即使打七折还能賺很多錢。我們举个例来看：当时门市染一件綢长衫要一元，但染費不到一角（工人为老板染一百件长衫，工資只有六角），这是多么大的利潤!

“預約券”发放期在每年春秋两季。一到发放期，这个老板便在申报、新聞报、广播电台做一个月广告，天天登报、日日广播，大肆宣扬买“預約券”的好处。有些市民受騙，紛紛前往“老正和”门市部购买“預約券”。粗粗統計一下，在他做老板的一段时期內，共发放了价值达一百万銀元的“預約券”。老板因为发放“預約券”发了財，“老正和”由一家门市扩大到两家，开了“老正和西号”，又到杭州开了大华水上飞机公司，还在上海开了一片香烟厂和一家照相館。老板生意越做越大，厂越开越多。同时“預約券”使用是无限期

的，而加染市价是随物价增长的。例如一件毛料长衫在一九二四年染价只七角大洋，发“預約券”几年后已涨到一元二角銀元。这样，实际上一张“預約券”已經不能抵原来价值使用，顾客去染东西还要另加鈔票。粗粗統計一下，“老正和”老板仅仅用“另加鈔票”的办法从“預約券”中賺的錢，就有十七万多銀元。

在“爱护劳工”金匾下

“老正和”老板对厂里工人的剝削是十分残酷的。那时，在“老正和”厂里挂着一块金匾——“爱护劳工”。这个老板是怎样“爱护劳工”的呢？解放前，染坊行业工人很少有工資，絕大部分靠綢庄給的一点微薄“酒鈔”过生活。开头，厂小，加工业务少，后来厂大加工业务扩大，“酒鈔”也增多。这时，老板又从“酒鈔”上打主意，规定从“酒鈔”总额中，他要提出百分之六，工人、学徒在分攤“酒鈔”时，老板一人又要抽取三份。这样，一大笔的“酒鈔”落入了老板的腰包。工人拿到一点点微薄的“酒鈔”，怎能养家活口？一遇到生病，那就更惨了。如当时有个工人相錦荣，生了职业性风湿脚气病，由于沒錢医，只得吃点米糠对付。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躺在床上一点不能动弹，从腿部肿到胸口，連喘气都很困难，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候，老板还是死人不管，

工人兄弟湊了一点錢給他去看医生，黄包车还没有拉出三間店門，相錦榮就断了气。当时他才三十岁，就这样被折磨死去！当时染坊工人由于长年累月双脚泡在污水里，很多人都生了职业病，有不少生病的工人，因无錢医治而含恨死去。

“老正和”老板拚命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時間长得吓坏人，一般一天要做十八九个钟头，生意忙时，要做二十一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逼着工人拚死拚活为他卖命。当时工人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在干活时出了差錯，老板不但逼着工人赔偿損失，还要罰款、停生意。有个工人徐世春，他連干了几夜活，整天头脑昏昏沉沉，一次在称衣片时弄錯了斤两，就被老板一脚踢出了“老正和”大門。

“老正和”老板自从发放“預約券”門市业务扩大后，他就縮減了利潤較少的加工业务，工人的“酒釧”也少了。老板为了騙取工人为他卖命，玩出了另一种新花样——发“底薪”！规定每月三元，一年三十六元。可是，这个“底薪”同样是只空心湯团。老板规定“底薪”不按月发，要等到年底才分，平时工人只好勒紧褲带过日子。每年四时八节，老板虽然准許工人支一点“底薪”，可是这个錢只是在工人口袋里过过道，等一下就要买礼物送給老板和老板的小老婆，就連老板的結拜兄弟流氓头子也要工人去送禮給他。誰敢怠慢不送，那准停你的生意。这样一送禮，还能有多少錢积

存到年底呢！这样还不算，有一年老板在杭州开的大华水上飞机公司没有捞到多少钞票，狠心的老板就把我们工人按月分的“酒钿”和全年的“底薪”全部扣下，一文不发。工人等到年关，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要求老板发一点钱过个年，可是，老板却纠集了一帮流氓打手、外国巡捕用武力弹压，并破口大骂：“工人多得如牛毛，可以捞一把拣拣，啥人不心痛我蚀本，便给我滚！”

老板剥削我们工人真是耍尽了各种花样。本来，“老正和”工场里高挂着黑底白字的禁烟牌，啥人抽烟，就要停生



工人要求老板发一点钱过个年，可是，
老板却纠集了一帮流氓打手、外国巡捕用武力弹压。

意。可是当老板开了香烟厂后,他又大发“善心”,逼我们工人抽香烟,不会抽烟的,也非要你抽不可,说什么“老正和工人不抽烟不洋派!”当时,有许多工人抽烟上了瘾,向老板支取下个月的“酒钿”吸烟,老板又规定工人只准买他自己厂里出的香烟,结果刮得我们工人囊空如洗。

“慈善家”的黑心肠

“老正和”老板是绍兴人,厂内工人绝大部分也是绍兴人。他为了欺骗当地贫苦农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正和”来做学徒,表面上装出一副大“慈善家”的样子,说要为家乡做点“善事”,硬逼我们每个工人捐款。这钱到了老板手里以后,他从中抽出一小部分,用他个人的名义,一九二八年在绍兴安昌装自来水消防龙头,在钱塘江造了一座过渡码头。这样,老板是“大善人”的名声便传遍了绍兴周围百余里,骗得当地许多群众信以为真,有的还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正和”来学生意。老板又在乡下物色了几个“荐头人”专门给“老正和”介绍学徒。这些“荐头人”在人家面前说:“老正和”是块金字招牌,去这家店学生意,吃穿不用愁;满了师不但每月拿“酒钿”,一年还有三十六元大洋“底薪”!这样,老板就从乡下骗来了大批十三四岁的孩子,到“老正和”学生意。当时我就是被骗的一个。我家里为了求

“荐头人”介绍，还借了债去送礼呢。

“老正和”老板是如此“慈善”，要踏进“老正和”门槛是如此不容易，可是，进了“老正和”的大门，却象跌进了人间地狱。

这个厂的学徒时间特别长，一般规定要学五年，并且是五年尾、六年头，生病的时间还要补足。老板剥削学徒的手段很狡猾。有时他看你学了几年，就把你调工种，并规定调做另一工种，又得从头学五年。如有个学徒徐言政已经学了两年多，老板再把他调做染衣片，再要他从头学五年，不照老板规定做，就要停生意。这样徐言政苦熬苦煎做了七年多学徒。有些学徒日夜劳累，被折磨得体弱多病、个子瘦小，就是学满了五年也不能满师，老板常常要给学徒加两年或三年的学徒时间。在学徒期间，每人每年只有三块钱鞋袜费。给学徒吃的是什么呢？一天三顿薄粥和霉烂的面条。早上没有粥菜，要学徒自己买，可是我们学徒哪里有钱买粥菜呢？

说起来学徒也可分到一点“酒钿”，但是老板订出了各种各样的罚规，把学徒一点点“酒钿”刮进他自己的腰包。当时老板规定学徒不准看书，如被查出来，要罚大洋一元；晚上学徒睡在染缸木盖上（当时染缸埋在地下），老板派工头来查人头，发现啥人不睡在那里，罚大洋一元。有时学徒一个疏忽，穿了破木拖板上楼，老板说你不懂规矩，就吩咐管

帳的把你一年仅有的三块钱鞋袜费全部扣掉。老板还特别规定了一种“敲门规”：老板晚上在外边鬼混回来，敲一记门就要学徒起来开，要是敲了第二记才去开门，那就要被打、罚。我记得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天夜里，老板在外鬼混，回来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睡在店堂内的几十个学徒已劳动了十多个小时，这时大家都正在呼呼地熟睡。老板敲了三记门，还不见学徒来开，后来由一个工人起来开了门。老板怒气冲冲一脚踏进店堂，挥动鸡毛掸子，噼噼啪啪将学徒一顿乱打，把学徒打得昏头转向。打了不算，还把几十个学徒的“酒钿”全扣掉。

“大慈善家”老板就是这样对待学徒的！平时，他常常手执藤条，无故把学徒打个“满堂红”（把所有的学徒毒打一顿），打了要跪，跪过要罚。在旧社会，我们工人、学徒被资本家逼得多苦！我有两个师兄，他们是亲兄弟（记得哥哥叫朱柏林）。他俩苦苦熬过了五年满师，却都因为长期受折磨累坏了身体。有一天朱柏林支撑着身体去做生活，头一昏，眼一花，跌在煮沸的肥皂水内，泡死在染缸里。不久，朱柏林的弟弟也象他哥哥那样，活活地泡死在染缸里。但是老板哪管你死活，他看学徒身上有大利可图，就专门大量雇用学徒。当学徒学满师的时候，老板就把他们绝大部分开除出厂，然后再招进一批新的学徒。在二十多年中，被“老正和”老板无偿地剥削五年而开除的学徒就有八百多人。你

看,这个老板的心有多么狠,剝削手段是多么残酷! 他的每个毛孔里都沾着工人的血啊!

染坊工人的新生

一声春雷惊天地,上海解放了。人們喜笑颜开地唱着: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

我們染坊工人也从心里唱出了两句話:“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染坊工人的新生命!”一解放,我們老正和染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組織。一九五六年实行了公私合营。我們工人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沈福庆,过去被资本家看成一块“废料”,解放后,政治上进步很快,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連我这个被老板看成“呆木头”的人,也成了生产小组长。当时,我曾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想:难道我們这些苦人儿今天交了好运么?不是!我們的翻身是因为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啊!

解放后,“老正和”在劳动条件方面,也有了大变化。过去老板只管剝削我們,不顾我們死活,不論严寒酷暑,我們工人成年累月赤脚泡在污水里做生活;现在,我們受到党和国家的爱护,每个工人身上有四件宝:橡胶围腰,长統靴,长手套,冬天还穿棉大衣。有些笨重的体力劳动的工

序，已經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染坊工人和其他工人弟兄一样，不但有了固定工资，而且生、老、病、死有劳保。我們厂內有个老年工人黄万余过去受尽老板折磨，生了肺病和胃溃疡，解放以前沒錢医，公私合营以后，厂里送他去治疗，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已恢复健康，参加生产。黄万余感动地说：“旧社会在老板手下，工人性命不如一根草！要不是解放，莫說一个黄万余，就是十个百个黄万余也早死了。”是啊！过去我們染坊工人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又没有劳动保护，生职业性风湿脚气病、肺病死去的人很多。解放后，劳动条件大改善，职业病已基本消灭了，原来生职业病的，特别是生肺病的人，经过治疗，都已恢复了健康。工人们常激动地说：解放前，我們染匠是黄连泡在苦水中——苦中苦；解放后，我們染坊工人是白糖渗进蜂蜜里——甜上甜！（金奎插图）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药老虎”发家史

黄浦区徐重道国药号党支部书记 张文显

上海北京路上，有并六开间门面的药店——徐重道国药总号。解放前，它是旧上海国药业中数一数二的一家大药店。这家药店的老板是当时有名的一只“药老虎”。那时候，这个老板在旧上海市区开设的分店就有十七间，还开了药酒加工厂、制药厂、制胶厂、药材行等。可是，象这个老板自己吹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大药店”，却是用二十几只银角子起家的。

“徐重道”老板靠了这二十几只角子，把药店弄得这么大，是不是象他所说的是靠“勤俭起家”的呢？不，这是骗人的鬼话。象其他资本家一样，在“徐重道”老板的“发家史”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我从小就在徐重道药店当学徒，听到和亲眼看到这只“药老虎”怎么吃人的许许多多事实。这里，我所叙述的只不过是一些片断。

二十几只角子起家

徐重道国药店老板，浙江慈溪人。他曾在汉口帮人家照管店务，眼看店里生意兴隆，非常羡慕，一心向上爬，想做资本家。一九一五年，他便到上海来“淘金”。到上海时，他身边衣袋里只剩下二十几只角子。怎么起家呢？他说：“若要发，众人头上刮！”后来，他看准了一个投机的好机会：那时上海滩上，妓院林立，很多人患花柳病。他便向熟人借了一点钱，在那时的派克路（现在的黄河路）上租了两间房子，挂上“徐重道国药号”的招牌，卖“妇女白带丸”、“五淋白浊丸”等等。他没有学过医，竟在自己的小店里，一面卖假药，一面做假郎中。

开头，店里没啥生意，他就站在店门口，看到过路人便打躬作揖，笑嘻嘻打招呼。日子一久，人头熟了。附近女佣人生了病进不起医院看病，也常到他店里来问病买药。当这些女佣人到“徐重道”那里来看病买药的时候，这个老板又在她们身上动脑筋，说什么把零星钱存到“徐重道”，利息大，又可靠。有的女佣人受了骗，见他逢人便笑，“人缘又好”，便把血汗钱存进他店里，日积月累，这笔数目倒也不小。但是这个老板心里明白，在这些女佣人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为了招徕更多主顾，便在假药仿单上印了十二个黑

色大字：“修合虽无人见，誠心自有天知”，向买主宣扬自己为人“正直”“公道”，以“道德”为重，同时逢人夸耀自己的药店是个“良心店”，为民解除疾苦。当时有不少人被他欺騙了，徐重道国药号的生意也慢慢兴隆起来。这个老板盘剝了一些錢，不久，便在成都路开了第二月徐重道国药店。

一九二三年春天，也就是他开第三月徐重道药店的那年，店里有个职员叫戴生茂，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想向上爬，能够当个老板，在新開路上找到一月店址，向“徐重道”老板拉点股子，想自己去开月国药店。老板說：“你有困难，我應該帮忙。”便滿口答应，还假惺惺地跟了戴生茂去看地段。“徐重道”老板到了那里，一看地段好：附近弄堂多，人口多，药店少，便笑嘻嘻地拉着戴生茂，回到店里一道打牌，接着說：“你不要开店了，錢存在我这里，这月店让我去开，每月付你利息，再給你做个阿大（經理、賬房之类的职位），坐第一把椅子！哈哈，你何乐而不为呢！”戴生茂經他这么一說，便把那笔錢給了“徐重道”老板。药店开起来了，戴生茂也当阿大了，可是“徐重道”老板不但一直不把这笔錢还給他，后来戴生茂經濟困难了，多次要討还这笔錢，老板就借口生意清淡，把戴生茂一脚踢开！戴生茂气出了病，回到乡下，不久就死了。

“徐重道”老板的家，就这样招搖撞騙地发起来了。

“优待券”和木图章

一九三〇年，这个老板已經在上海开了第十月徐重道国药支店了。这一年，他在北京路上开了徐重道国药总号。他在开国药总号的时候，不惜工本，店堂里全套紅木設備，门面裝飾得富丽堂皇，砌上什么“国药环球总店”、“首創发明参燕百补膏”、“养血补脑汁”、“妇女調經药”等等，用来欺騙顾客。

资本家发财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滿足的。徐重道药店一月一月开出来，这个老板整天动脑筋，打鬼算盘，来实现更大的騙局。

有一天，老板把一个临时工龔元华叫到房里，对他說：“从现在起，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給你一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兜圈子。看到弄堂口、马路上有医生招牌，你就把它抄下来，写明几弄几号，叫什么名字，拿来給我。”从早到晚，龔元华的自行车踏遍了上海大街小巷。一个个医生的名单，出现在老板面前了，他就把医生的名字編了“一〇一”、“一〇二”等等代号，叫自己的亲信采办礼物：名医送皮貨；一般医生送扇面、雪花膏；业务清淡的医生送水果糖。随礼物送去的，是一叠叠“优待券”，上面印着“誠意为病家服务，七折优待”等文句。虽然礼分輕重，但医生感到情面难却，开

好药方,就顺手递给病家一张“优待券”。旧社会里,中药利润很大,一分本钱,三分五分利润不足为奇,而且常常是一种规格,可以定出几档价目,看人论价。所以“优待券”并没有什么优待,不过是用来招徕生意,骗骗病家的。

店里生意好起来,老板叫自己的亲信去刻了“謀”“民”“众”“健”“康”五只木图章,对职工说:“你们做生意头子要活络点,看人头做生意。对衣着好的人,药方上敲个‘謀’字图章,药材拣中心段的大片子,药价开得大点,好敲,就多敲一点;衣着一般的敲‘民’字图章,也好敲一点钱;穷人来买药,敲‘健’‘康’图章,把次药放进去!”

代客煎药的真相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剧增,因居住条件不好,患病的人日渐增加。“徐重道”老板灵机一动,他认为这正是发财的好机会,便乘人之危,进行欺騙剝削。这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电车上、报刊上、电影院里,出现了一批新式广告:“徐重道国药店,首创代客煎药,随接随送,日夜服务”;“本店誠懇为病家服务,首创代客煎药,选料道地,配煎认真……”。有些人看到了这种广告,便把药方往徐重道药店里送。老板站在店堂里,眼看着顾客把药方送进来,总是堆着笑:“你们放心好了,我们马上就

煎，煎好就送。”顾客出了门，他就叫职工把那些霉药、坏药放进药罐，原来需要分头汁、贰汁煎两遍，他却只准煎药师傅把头汁、贰汁药一次合煎，多放点水，一烧开，就倒进两只药瓶。

在抗战初期，上海“租界”里設立了許多难民所。“徐重道”老板又动出了鬼脑筋，他向这些难民所的主持机关去游說：“‘徐重道’是良心店，重道不重道，只要看我这块牌子；现在国难临头，全上海难民所的药，我全部包下来，七折优惠，为难民煎药送药。”就这样，上海玉佛寺、金司徒庙、浙江路等十多个难民所里的难民生了病，配药煎药全部由徐重道药店办理。老板把这笔生意抓到了手以后，就对煎药师傅說：“现在店里代客煎药忙啊！分不开手。凡是难民的药，一律到夜里十点钟以后煎，反正是舍施药，救济的！”他又到店堂里对配药师傅說：“难民药方一来就是一百多张，你們来不及秤，不要秤了，用手抓两把算了！”深夜里，我們送药工人把药送进难民所里，有的难民病重，等不到药送去，已离开了人間！送药师傅看到这般惨景，怎么不心痛呢？可是老板眼看煎药生意越来越好，霉药、蛀药暢銷一空，发了大財，乐得心花怒放，还毫不知耻地在背地里說：“真是种田靠天，做生意靠騙呵！”

挂羊头 卖狗肉

资本家利欲熏心，哪顾病家死活，生意越好，心肠越毒。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他看到劳动人民中暑的很多，就“发明”了一种“甜质金银花露”，并在各大电影院大做广告，说是清火解毒，喝了可以防止中暑等等。有些人上了他的当，就来买他的金银花露。“徐重道”老板站在药房里笑咪咪地对职工说：“金银花露来不及用蒸馏水，用大锅煮煮就行了！”职工不同意，要照方配制。他却说：“你晓得什么？上海人吃噱头，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就可发大财！”制造丸散胶丹，各种药品都有一定份量，“徐



老板对职工说：“金银花露来不及用蒸馏水，用大锅煮煮就行了！”职工不同意，要照方配制。

重道”老板呢，却动了許多脑筋，专门写成了一本“徐重道罕有丸散配合簿”，上面用毛笔写上了“牛黄至宝丹”、“紫雪丹”等等药名，凡是成方中用到的麝香、羚羊角、犀角等貴重药品的份量，都被他减去一半，甚至麝香里还要掺盐卤。有一次，他的一个亲信把盐卤偷偷放进麝香里，被一个职工看见了，当场把他抓住，經理走过来，弹着眼睛說：“是老板叫放的！”后来，老板来了，他奸笑地对合药师傅說：“你們尽管放心大胆做好了，药料磨粉做丸药，神仙也难識真偽。”有一次，有人把一只死羚羊的角拿来卖给徐重道药店。一般成药用的羚羊角，角上有血筋才有效用，死了的羚羊角不能成药。而老板的亲信却买下了这只死羚羊的角，把它配进丸药里去了。不但配制贵重的成药，老板要掺假，就是配制一般的成药，他也要搞鬼。如治咳嗽的“枇杷膏”等，药和糖都有一定的比例，他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潤，就不管什么配方不配方，如药价贵时，就多掺糖，少放药。“虎骨木瓜酒”是治筋骨痠痛的药酒，有祛风活血功效，处方中有虎骨胶、木瓜、紅花等十几种药品。老板說，“这酒是吃白相的，只要喝了能醉就达到功效了。”于是他把十几种药料全部减掉，只用生黄枝子打碎泡在水里，掺入土烧中，加点糖精，看来顏色好，味道甜，可是治疗效果一点也沒有。解放前，“徐重道”老板依靠偷工减料，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騙得多少錢財！

残酷的剝削和压迫

“徐重道”老板对店內职工的压榨是十分残酷的。学徒进店以前，他先笑嘻嘻地問介紹人：“人品长得好嗎？口齿伶俐嗎？出手快嗎？什么地方人？”凡是苏北人，不会討好顾客的，他一律不收。职工进店以前，也要再三盘問介紹人：“上海有家嗎？”要是上海有家的，他也不要，怕他們把店里的东西拿回家去。每年逢时过节，他总要辞掉二三十人，招进一批帮工。据一九四二年的統計資料，徐重道药店一百多名职工中，全部不超过三十岁，快滿三十岁的职工，名字上已經划了紅圈。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旧社会失业者很多，辞掉一批职工，招收帮工，可以少支出工資。一九四七年，“徐重道”又招收了一批帮工。这些帮工进店以后，老板规定：先試用三个月，試用期滿了，正式成为帮工的，工資一律打六折。一进店门，还要填三份关书：一份“雇佣书”，一份“荐保书”，一份“守則书”。他还訂出了許多店规，縛住职工的手脚，一个不对，就請你滚蛋。

有个职员名叫周嘉岳，生胃病，有一天，他站在柜台上做生意，胃病发作了，痛得实在支撑不住。为了怕老板见了要停生意，就偷偷地拉开药抽斗，拿了两顆不值錢的豆蔻，放进口袋，做好生意，用开水服下肚去。可是，給老板知道

了，說：“周嘉岳，你違反店規，偷藥吃，從現在起，另請高就！”周嘉岳就此被踢出店門。有個青工名叫張水堂，由於受老板折磨，得了肺病。他偷偷地請醫生開了藥方，拿了方子到店里配藥。老板一看藥方，知道張水堂得了肺病，就把他一脚踢出店外。更慘的是，有個孤老头子名叫老洪頭，在徐重道第二支店做丸散師傅，無依無靠，到晚年才討了個老婆。老板知道了，怕他討了老婆，開支大了，要偷東西。到八月中秋那天，老板給了他一張卡片，上面寫道：“本店無意僱傭，另請高就。”老洪頭拿了這張“催命符”，回到家里，老婆看他失業，跟他離婚了。後來這個老洪頭活活餓死在店門口的人行道上。

我們這些僥倖保住飯碗的人，日子也不好過，真象藥店櫃台上的揩布，揩來揩去盡是苦。記得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職工從早到夜累死累活給老板賣命，老板給我們吃的是什麼呢？他倉庫里大米堆得小山高，發了霉，叫職工炒焦磨粉，制成“五香飯灰”，賣給病家。給我們吃的常常是驛着石砂的面粉六谷糊，難得吃上几頓爛飯薄粥。他還嫌我們胃口大，暗里关照飯司務：“飯要煮得爛爛，粥要燒得薄些。”說到工資，真低得可憐，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二斗米，這樣我們自己顧自己還很困難，哪里還顧得上家？如果碰到家里有人生病，那就更慘了。有個職工名叫岑秀章，他女兒生了病，因為沒有錢延醫買藥，病死了。很多職工為生活所迫，

不得不白天忍受着繁重的工作，一到夜里，瞒着老板到街头去做小贩。狠心的老板还常常不发工资。他笑着说：“你们不要急，我实在没有钱，有钱会给你们！”

职工们恨透了老板，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午，二十四个职工，在店楼上开了个小会，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谁知道，刚刚坐下，老板的电话早打进了伪警察局。十点钟光景，徐重道药店被伪警察包围，伪警、流氓手持武器冲到楼上，用枪口对准职工，说：“不许动！一个个名字都写上！”这时，“徐重道”老板和经理也来了。老板露出狰狞的面目，指着职工说：“这是非法开会，这是捣乱！”他嘴巴一歪，伪警就把职工带到楼下店堂里，排成队，要用绳子绑起来。这时，经理走过来了，假惺惺地笑着说：“不用绑了！带走吧！”

就这样，这二十四个职工被抓进了监狱。第二天，老板串通伪警察局，逼他们每人填一张“无条件解雇书”，如果不填，就要关在牢里！这二十四个人从此失业了，挣扎在死亡线上。

新药店 新作风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劳动人民终于见到了太阳。一九五二年，由于“徐重道”老板在解放后继续偷工减

料，危害病人，我們和他开展了斗争，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他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项运动，徐重道药店改变了面貌，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人民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国药企业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经营作风，建立了各种科学的责任制度，提高了服务质量。进药、配药、煎药、送药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真正做到了为病人负责。譬如拿煎药来说吧，各种药的煎熬时间，都有一定规定，在操作过程中，还做到药汁煎透，药渣撇干，按照病人规定时间，及时送上门；来方配药，也是同样做到尽量满足需要。在药物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从原料到成品，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复核，尽量做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公私合营后，我们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有的职工当了公方经理。我们职工的生活也逐步提高，生老病死有劳保。过去不少患肺病的职工，都得到了治疗，恢复了健康。领导上对我们各方面都很关怀，店里还设立了图书站，不少工人进了业余文化学校。经过党的教育，我们职工的政治觉悟都有提高，有的同志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我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想想过去“徐重道”这黑店，看看现在徐重道国药号新面貌，真是两个世界，两种景象。（琦平插图）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

童工血泪

永福源铰链厂厂长 施灿荣

解放前，在上海西康路上的菜市弄里，有片小小的永福源五金厂。这厂是怎样起家的呢？那是一九四〇年，民通纱厂有个叫周锡生的“领班”，原先是个地主，他凑了一点钱，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在菜市弄里租了一间不满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四个童工，敲敲打打，弄起了这厂专做表带、拉链、铁锁的小作坊。后来，周锡生把另外两个人的资金并掉，成为他一人独资经营的企业。他把自己的老婆——在纱厂做“拿摩温”的沈杏娣叫了回来，做了监工头。到上海解放，这厂永福源五金厂的财产可不小啊！光是机器设备，就有电动车床、冲床、刨床、钻床三十多台，扩建的厂房有六百多平方米，雇用了一百五十个工人。至于材料嘛，周锡生一下子就能买进二十五吨铜皮，折合人民币，价值二十多万元！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只不过短短十个年头，周锡生怎么会发得这样快呢？他和老婆沈杏娣又从来不参加

劳动。和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完完全全是吸了工人的血，才喂肥了自己的。

卖身契

资本家最残酷的剥削手段之一，是榨取包身童工的无偿劳动力。周锡生和沈杏娣在这方面是十分“能干”的。解放前夕，这个厂有一百五十个工人，这里面，包身童工就有一百二十七名。这些童工是怎样来的呢？资本家周锡生、沈杏娣从开厂那天起，为了取得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乡



每个童工进厂，都得在一张卖身契
——关书上接手印。

下的亲戚朋友，专门招收那些貧苦孤儿，作为童工。例如周錫生有个在无錫乡下教书的妹妹，她碰到学生当中有人不幸死了爹娘，就乘机說：“啊呀！小孩子死了爹娘，怪可怜的。我哥哥在上海开工厂，我介紹你們去做外国銅匠，学点手艺，要比在乡下好得多了！”一九四三年，这个人用这种欺騙手段，一次就騙了七名童工到厂里来。

童工进了工厂以后，老板娘沈杏娣就領他們到楼上佛堂間里，凶神恶煞似地宣布說：“你們都是童工，家中无法生活，到了这里，要服从厂里的一切规矩。我是你們的大人，你們要听我的話，不准回家。要是誰走了，我要找介紹人赔偿三年半飯錢！”

每个童工进厂，都得在一张卖身文契——关书上按上手印。这张文契上讲明死了与厂无关，一切絕對服从厂主等語。凭了这一张关书，童工們就成为任凭資本家残酷剝削的奴隶了。

做牛马

資本家招罗了大批童工以后，首先是延长工时，进行残酷剝削和压榨。那时厂里规定，凡是童工，一律从早上四点多钟开工，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歇工，实足足要做十九个钟头。老板娘沈杏娣，是厂里的监工头，她把紗厂里“拿摩温”

对付工人的一套办法，搬到厂里来变本加厉地对付我们这些童工。天还没亮，沈杏娣就起床了，她走进佛堂，打开收音机，同时高声地念“阿弥陀佛”，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之后，她一手拿着念佛珠，一手拿了鸡毛掸帚，走到我们童工睡的统铺旁边，掀起被头，对起床动作较慢的童工，就“啪啪”地接着次序打下去，嘴里高声喊道：“小鬼！起来了，太阳爬上屁股了！”“小死人，懒死人，快起来！再睡我要搁了！”就这样，我们都被她逼起了床，脸都没洗，就跑到脚踏冲床旁边，“蓬蓬蓬”地踏起来。吃过中饭，老板娘睡觉了，我们就在机器旁边吃饭，放下碗，又上工了。到了夜里，我们已踏了十几个小时冲床，早已提不起脚，伸不动手，挺不起腰了。这时候，老板娘却精神十足地来监工了。要是谁打瞌睡，她就拿鸡毛掸帚往谁头上抽，碰到谁完不成老板规定的生活，就是夜里已经睡到床上，老板娘也要把你拖起来毒打一頓，打过以后还要逼着你去做完规定的数量。

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一九四六年夏天，厂里有个童工叫丁林富，他做的是第一道工序——表带扳模，一种坦克履带式的手表带上的零件。因为钢皮很薄，生活难做，没有办法完成。老板眼看他没有做足规定的数量，第二天其他童工的生产要脱节了，就把丁林富从床上拉起来，破口大骂：“小赤佬，你倒定心睡觉了，这是你存心捣蛋！”老板一面骂，一面就随手拿了一根皮

帶，猛力地往他身上抽打。那時丁林富赤着膊，下身穿條破爛的短褲，被打得渾身是一條條血痕，痛得在地上打滾。這時候，站在旁邊的老板娘沈杏娣，變做一只笑面老虎。她見老板打得乏了，就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帶，笑嘻嘻地說：“林富，趕快去做吧！識相點，打你也是為你好啊！再不做天要亮了，明朝生產接不上，你更倒霉了。”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邊。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淚，縮着身子，在陰暗的燈光下，又“蓬蓬蓬”地干了起來。老板說：“明天下班前，你不做好一萬四千節表帶零件，我要你的狗命！”

夜，很深了，我們躺在床上，听着車間里丁林富做表帶扳模的一陣陣沉重的撞擊聲，就象千萬個錘頭打在我们心上，我們怎么也睡不着覺了。這次，丁林富沒有離開機器，從半夜做起直做到第二天深夜。

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老板周錫生接到了一批鐵鎖生意，利潤很高，數目又大。他為了交貨賺錢，就強逼童工拚命勞動。廠里有個姓張的童工，還只有十四歲，老板規定他一個人繞鐵鎖彈簧，供應其他十幾個童工。這個童工拚命地做也來不及。那天，老板娘眼看生產脫節，就拉着他的耳朵拖進佛堂間，逼他跪在菩薩面前。她舉起一根雞毛撻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夾頭夾腦地向他打去，還高聲地罵：“小赤佬，你就是偷懶，這批生活你做不出，我要你的命！”她一邊罵，一邊揮着手里的雞毛撻帶，狠狠地抽打他。

頃刻間，这个赤膊童工的肩上、背上、脸上暴起了无数条血痕，他的手也被老板娘打肿了，还被逼到车间里繞弹簧。

剪手指

資本家的財富一天天增多了，工人中的工伤事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惨！

一九四八年，永福源五金厂已发展得具有相当规模了，厂房扩展了，机器、职工人數，都大大增加了。可是由于老板只知发财，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所以在一百五十个工人中，被机器軋断手指的就有一百多人！被机器炸瞎眼睛的有一人，有两个童工因工伤而死亡。

那是一九四七年，有个十五岁的童工名叫王才寅。有一次，他的两只手指被机器軋断了，但是骨头还没有全部断掉，老板娘就用剪刀把骨头剪断。骨头剪断后，老板娘又当场逼他一手吊在頸里，一手上冲床劳动。結果，王才寅痛得昏倒在车间里。王才寅昏倒后，童工們把他扛到擱楼上。他不吃不喝，老板也沒有給他医治。几天后，王才寅病死了。他死后，老板說：“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老板非但把我們看成不如一条狗，就是对他的亲戚也不例外。那种残忍的手段，充分地表现了資產階級的剝削本性！

記得是一九四五年，老板周錫生有个内侄，也就是沈杏娣的姐姐的儿子，名叫繆福炳，住在江阴乡下。繆福炳小时死了爹娘，留下兄弟四个，在乡下艰苦度日。到繆福炳十四岁的时候，老板觉得机会来了，就到乡下去伪装慈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内侄，爹娘死了，还有我这个姨父在，就跟我到上海去吧，四个人统统到我家吃饭，我供养你们读书！”孩子们听了，觉得有这样的好姨父，当然高兴，就跟他来到了上海。可是一到上海，这四个小孩就成了他的童工，同样受尽他的残酷剥削和折磨。

有一天，繆福兴——繆福炳的十岁弟弟——的手指被冲床轧了，骨头还没有完全轧断，老板娘拉着他耳朵，走进佛堂间里，拿了剪刀，对福兴说：“你怎么这样不小心，连手指都轧了？哈哈，轧了也好，到五金厂来当学徒，不轧掉手指是不能满师的，这是做老师傅的记号。来来来，我给你用剪刀修修齐！”话音刚落，老板娘就一手捏住繆福兴的手，猛力剪了三剪刀，可是骨头还是剪不下来，她就灵机一动，叫人把车间里剪铁皮的大剪刀拿来。大剪刀拿来了，老板娘脸上露着笑容，在佛坛前对满头大汗、脸无人色的外甥说：“福兴！你不要看，熬点痛，剪掉了，就会好的。”说着，她就拿起大剪刀，“咔嚓”一声，把福兴的手指骨剪断了，随手往香炉里抓了把香灰，涂在福兴鲜血淋漓的断指上，又给他敷了点车油，弄了块破布，包扎定当，摸出一些零钱往

地上一摔，笑嘻嘻地說：“好了！小赤佬，买根油条去补补血吧！”

睡觉难

童工，非但在一天十九小时内被资本家任意剥削和压榨，就是在十九小时以外，也同样受尽摧残和折磨。

解放前，西康路小菜场旁边有座小小的“七重天”。或许有人要问：什么叫做“七重天”？我们的“七重天”，就是在永福源厂的三层楼里，再用木板吊起四层小棚棚，每一层只不过一米高，有十五平方米，要睡十五个人。寒来暑往，我们夜夜睡在这里。而这种“七重天”的地铺，还是年纪较大的童工才能享受得到的。

那时的永福源五金厂共有一百五十名工人，可是睡进“七重天”的只有六十名，有近九十名小童工，没处安身。冬天，小童工缩着身子，盖着麻袋、废回丝，挤在车间里的冲床底下。夏天，“七重天”热得象蒸笼一样，根本没法睡觉。那时候，所有童工成群结队地到小菜场去过夜。可是，从厂里十二点钟下工，睡到夜里三四点钟，菜场里上市了，我们只得躺在马路上。这种生活，真是人间地狱，永世难忘！

老板为什么要搭这样的“七重天”呢？道理很简单，为

了追求最大的利潤。在工人身上多花一分錢，他是不干的。举个例來說吧，那时候，“七重天”里装的电綫都是些废旧电綫，要是稍不小心，随时有触电的危險。有一天，有两个童工黑夜爬进去睡觉，忽然間，肩背被天花板上的电綫吸住了，全身麻木，幸亏爆断了保險絲，这两个童工生命才未断送。

餓肚皮

晚上沒处睡觉，对我们童工來說，还算不上是最大的苦难。老板的更加毒辣的手段，就是他为了刮更多的錢，长期不給我們吃飽肚子。那时候，我們每天为老板做近二十个小时的牛马活，可是我們每天吃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每天，我們烧早粥的时候，老板娘站在旁边看着，烧得干了，老板娘不但要打罵，而且要放进冷水，使厚粥变稀。那时老板规定八个童工吃一小桶薄粥，吃完了就不能再添，誰吃得慢，誰就餓半天肚子。即使吃得很快的人，因为粥稀，又沒有吃飽，所以同样挨餓。那种稀粥，稀得可以照见人的面孔，如果把飯勺用力放进粥桶，粥湯濺起来可以濺到楼板頂上。我們每天过粥的“小菜”又是些什么呢？那常常是八个人一撮盐，用筷子蘸蘸，有点咸味就下肚了。到了夏天，老板娘就叫我們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切成小块，放上盐給

我們当菜吃。按照老板和老板娘的說法，这是他們乡下的“名菜”，“吃了不会生病”！

这样还不算，更加毒辣的是，夏天早晨，老板娘故意多烧稀飯，每一頓，总要多烧七八小木桶，放在老板娘房里，放到中午，稀飯发餿了，她才拿出来給我們吃，这样，可以使我們少吃或者不吃。有一次，我們拿了发餿的稀飯吃不下去，老板娘就强迫我們吃。她见旁边一个童工吃不下去，就說：“为什么不吃？”伸出手掌，就“啪啪”打了这个童工两下耳光，一面又摆开女流氓架子罵开了。有一次，刚吃过早飯，有个十六岁的童工陈兆祥，因为肚子沒有吃饱，拿了飯碗走进老板娘房間去盛粥，說：“我还没吃饱！”老板娘见了他笑笑，随手捧着她自己吃的一鍋精鍋又干又白的粥，对兆祥說：“来，小赤佬，沒有吃饱我端給你吃！”她說着就跑下楼来，在车间里当着許多童工的面，盛了滿滿的一碗，放在陈兆祥面前，叫陈兆祥吃。她一面看陈兆祥吃，一面一手捧着鍋，一手举着飯勺，看陈兆祥吃完，就用手里的飯勺又給他盛滿了，二碗、三碗、四碗、五碗……，陈兆祥实在吃不下了，可是老板娘还是硬逼着他把滿滿的一鍋精鍋子粥吃下去。粥是吃完了，可是陈兆祥胀着肚子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候，老板娘就逼他去劳动，陈兆祥站也站不起来，怎么去劳动呢？这时，老板娘凶相毕露，狠狠地罵：“你吃倒会吃，做倒做不动！”举起手就拚命地打了起来。

我們从早上四点钟起,要劳动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又沒有吃飽,怎么行呢?有一次,有个童工叫王友富,在夜里十二点钟,摸到老板娘房里去盛了碗粥,給她发现了。老板娘拉着他打了两下耳光,又叫人在工场間长凳上把他反綁起来。王友富一面掙扎,一面憤恨地說:“我实在沒有吃飽!”这时,老板娘更加凶狠地拿着一根棒,猛力往他身上打。这还不算,她还走到“七重天”,叫醒每个童工,叫我們排着队,每人輪流用木棍重打王友富三下。那时排在前头的童工睜着愤怒的眼睛,把老板娘交給他的木棍摔在地上,說:“我也餓着肚子。”老板娘見他不打,就“啪啪”打了二記耳光,并且还举起木棍高声地喊:“小赤佬,你們要造反了!”把我們乱打了一陣,大家跑散了。

为了吃飽,我們夜里下工,每人都到菜场里去拾菜皮,拾来后放在一只小罐头里,到隔壁翻砂厂的火炉上烧熟了吃,作为一頓夜点。

“休息夜”

黃連树下的童工生活,比黃連还苦!长年累月,我們沒有廁所,沒有工資,沒有开水喝,沒有毛巾洗脸,沒有衣服穿,凡是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权利,全都被老板剝夺了!那时候,我們許多人是用麻袋遮身的。我們几个月不洗一次

脸，身上老白虱多得可以随手抓。那个时候，老板规定我们半个月有一个“休息夜”，可是什么叫“休息夜”呢？所谓“休息夜”，就是到了该休息的这一天，从早上四点钟开工到夜里七点钟歇工，歇工后，老板娘监视着我们大扫除，把车间里所有的垃圾扫干净后，再逼着我们从垃圾堆里拣铜屑。拣完铜屑，已经九点钟敲过。第二天早上又是四点钟开工！半个月一次的“休息夜”常常落空，逢年过节总可捞到休息了吧，老板也不准。为了争取休息，一九四八年立夏，我们童工向老板提出休息一天的要求，老板不答应，童工们商量决定把马达电线剪断。这一天，车子开不出来，老板急得满头大汗，请了附近一个电匠来修。这个电匠也知道老板迫害童工手段毒辣，我们对他说：“不要马上给他修好，给他拖。”电匠笑着点点头。老板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修好，他爬上爬下，皱着眉头说：“要找原因，至少要到晚上。”电匠拖到晚上才修好，气得老板发抖，我们休息了一天。

那时候，不管天冷天热，厂里不供应开水，我们童工劳动得气喘嘴干了，只好到小菜场井边去喝冷水。早晨，大伙都不洗脸，每个人的脸孔，黑得象锅底一样，头发也老长。至于工资，那就更不用说了，老板每月只发给我们刚够剃一次头的月规钱。

我们这些童工，就是这样过着蓬头垢面、衣不遮体、挨冻受饿的痛苦生活。

庆新生

上海解放了，我們得到了新生。我們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上海市总工会特別关心我們这个童工厂，大力帮助和支持我們。一九五一年，我們厂里成立了工会組織。一九五二年，厂里进行民主改革，經過揭发斗争，揭发了老板許多迫害童工的罪恶，人民政府把他判处了三年徒刑（保外执行）。我們的劳动条件，在解放后也很快得到改善。我們这个工厂，是全上海第一批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工厂中的一个。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三十多个工人，个个得到了医疗，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全厂工人的工資进行了合理調整。在党的领导下，还拆除了“七重天”，新造了工人宿舍，原来睡地鋪的，都睡上了木床，不少工人还搬进了新村。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厂机器設備全面进行了革新，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每台机器都装上了安全防护設備。现在工人在车间操作，只要站在机器旁边注意机器正常运转就行了，劳动强度大大減輕了，人身安全也有了保障。我們这批解放前的童工，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了。我們当中大多数人响应了党的号召，到外地参加建設。现在，北京、天津、福建等地都有我們这些旧社会“童工”的足迹。留在厂里的，有的人当上了技术員，有的

当上了干部。有些人还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九五四年入党的，一九五九年担任了厂长。我们这个工厂，自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在国家的帮助下，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心里是多么欢乐啊，又有多少话要向党倾诉啊！（韩 伍插图）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

在“40000”的后面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委宣传委员 黄玉成

解放前，上海人看到“40000”这个号码，就晓得这是“祥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头。就在这个号码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罪恶！

半辆汽车起家

祥生汽车公司老板（以下简称祥生老板）本来是“礼查饭店”（现在的浦江饭店）的西崽。这个饭店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外国人。当时，祥生老板看到这些洋人来来去去都要坐出差汽车，但那时上海只有一个美国商人经营出差汽车，总共不过几辆。祥生老板眼看出差汽车生意好，赚钱多（每小时要收车费四、五块银元），一九二〇年，他就向人借了点钱，拼拼凑凑，和别人合伙购买了一辆杂牌货旧轿车，临时雇了个司机，抛岗在“礼查饭店”门口，专揽洋人的生意。以后，他又通过投机取巧、买空卖空

的手段，套进了四辆汽车，就在武昌路开起“祥生汽车行”。

祥生老板懂得，在上海滩上站住脚，首先要依靠外商买办，勾结流氓地痞，做自己的后台老板。因此，祥生老板就很快与几家洋行的买办拉上了关系，巴结上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并买了个什么“特别巡捕”的衔头，结果车子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的时期，祥生老板又投大汉奸吴世宝之所好，亲自送去了一辆汽车。他还依靠沪西大流氓朱顺生，一手包揽“好莱坞”、“六国饭店”等大赌场、舞厅和大饭店，以及火车站、轮船码头、机场等专利业务。汉奸陆连奎死了老婆，祥生老板就免费出借五十辆汽车给汉奸出丧用。他一面讨好汉奸，一面大做“祥生出差汽车广告”，当时曾轰动一时。

抗战胜利后，祥生老板又勾结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还送给陆京士三辆汽车。他自己也“官运亨通”，挂上了一个什么“上校”衔头，来欺压工人，欺压人民。

祥生老板有了依靠，有了后台，就更加残酷地剥削职工，“日进斗金”、“财运亨通”，不过二三十年工夫，祥生汽车公司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出差汽车公司之一。当时它拥有二百七十多辆汽车，雇有五百五十多个职工，并设置汽车站二十一处，还建立了一千多平方米的汽车修理保养车间。那时祥生汽车公司真是显赫一时。这还不算，祥生老板还到处搭股，如过去的中国纺织厂、亚洲银行、中国国货公司、

民誼药厂、金門飯店、大鴻运酒楼、康乐酒家、浴德池、大众殯儀館等等，都有他的股份，并兼任十多家企业的總經理职务。

要命的“三保”

祥生老板对职工的剝削是十分残酷的。一个司机要想进祥生汽车公司，除了要拿出五担米的代价向祥生老板的亲信作为运动費外，还要向祥生老板交上“三保”：現金保、鋪保、連环保。

司机进“祥生”，先要拿出一百块銀元作为“上生意”的保証金。很多司机为了向祥生老板交上保証金，只得把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卖光、当光，或者去借高利貸。这样很多司机虽然进了祥生汽车公司，但一年到头就是借債、还債、欠債，没有一个尽头。如有个姓刘的司机，当时失业，一家七口生活无着，但为了“上生意”，好容易湊些錢七轉八弯地請人介紹进祥生汽车公司。为了向祥生老板交上一百元的“保証金”，他餓着肚子天天东奔西走，却只借到二十块錢，还差八十元，沒有办法，心一橫，咬着牙借了八十元“印子錢”。他生意是上了，但家里連鍋盖也揭不开，全家望穿眼，直熬到发工資那天，拿到了十几块錢工資，祥生老板亲信要他送礼，高利貸者逼他还債。这样一来，哪里还有錢拿回去养家

活口，全家只得繼續挨餓。為了生活，他只好再去借高利貸。有個姓蕭的司機下手，為了想做司機，就在總站里請大家幫助，向其他司機借錢，五角、一元，零零碎碎湊到幾十塊錢。祥生老板知道這件事後，竟指着他的鼻子罵：“你這個窮鬼，胆子倒不小，竟敢在這裡搞鬼，快卷鋪蓋回老家去！”姓蕭的就這樣被老板停了生意。

祥生老板所規定的“現金保”，實際上是一種強盜式的掠奪。

有了“現金保”不算，老板還規定司機要找到洋行、錢庄、百貨公司之類的行商做鋪保。一般的小商店，如剃頭店、老虎灶、裁縫店、煙紙店的保都不要。所以進祥生汽車公司的司機，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和代價，托人求情送錢送禮，求那些行商老板做鋪保。祥生老板在保單上規定：“……如有不測，乃由天命，與本公司無關……立志願書人和保證人不得借故要挾本公司……”這樣，老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剝削司機了。司機呢，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個鋪保，為了保牢飯碗，逢年過節要向做鋪保的老板送錢送禮，否則就不太平，要停生意。例如有年中秋節，有個姓劉的司機實在無錢送禮，保證人一氣之下，就跑上門，吵着要去退保，這個司機只得借了二十塊錢送去，方才了事。

有些司機實在找不到老板規定的鋪保，就只好設法走“內綫”，送錢送禮，托人買通老板的亲信，去向祥生老板說

情，找三、五个现职司机做自己的“连环保”保人。但倘若这个司机一旦出了个什么大事故，赔偿不了祥生老板的“损失”时，那被圈在一起的“连环保”司机，就要共同分担“责任”，赔偿祥生老板所规定的莫名其妙的“损失”。这样，就使司机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永远被老板所控制。

好长的班头

祥生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还用少雇人、多出差的办法，规定每个司机要连续做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才得休息一天。很多司机为了糊口，常常带病开车。有的实在煎熬不住，就把车开到半途停下来，向乘客打个招呼，借口去小便，乘机闭一闭眼睛，或站在风头里吹一吹，透口气。有的司机为了提神，就用万金油涂在眼皮上刺激一下。有的还用香烟头含在嘴里咀嚼，强打精神。这样就常常发生行车事故。发生事故后，倒霉的当然还是司机，祥生老板是一毛不拔的。

往往还发生这种极为悲惨的事：一部分司机实在支撑不住，病倒了，班头上的司机就是连续做了三天三夜，也不允许落班。祥生老板为了赚钱，哪管司机死活，看见谁落班，就用停生意来威胁司机。司机为了保牢饭碗，只得硬着头皮、睁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为老板卖命。有的司机就

这样被逼連續做五天五夜、六天六夜。有个叫陆麟书的司机，連續做了近百小时后，实在做不动了，要求老板让他請一天假休息休息。老板对他說：“你要休息，請你回家去休息，上海找一只狗倒勿大容易，招一百个开车的很便当。”老板說着看看陆麟书还不出车，就又威胁說：“你还站在此地勿动，耽擱了生意，找你算賬！”陆麟书只得把车勉强开走。他眼看自己快要倒下来了，心里明白，若再开下去，一定要出事，就冒着被开除的危險，把车开进总站，决定回去休息一下。他昏昏沉沉地离开车子，搖搖晃晃地离开车站，刚过马路，还没走滿百步，就在金城电影院（现在的黄浦剧场）门口，双手抱着电綫木杆，活活地累死了。

那时，这种悲惨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司机孙福社，也因开车時間过长，疲劳过度，一天，当他把车子开到保修車間換汽车座墊时，竟弯着腰，两手撑在座墊上，死在车厢里。司机郭祥云因劳累过度，在东湖路汽车站暴死。司机丁庆祥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就倒在地上死了。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工人累死了，老板根本不負任何责任。

拿不到的工資

祥生老板对工人的剝削，同所有的資本家一样，真是挖空心思，絞尽脑汁。他还訂了很多规定来榨取工人的血汗。

其中仅赔款这一条，就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

当时司机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元左右，而老板对司机少得可怜的工资也要想出种种罚款赔偿办法，把它捞回去。如车子放出去，乘客跑了，就要在司机工资中扣除“空放回票款”。司机送走乘客，空车回站时，因为路上车多塞档，或多“吃”了几只红灯，或者其他原因而超过回站规定时间，就要扣司机的“过时款”。有些司机因连续做了八九十个小时，偶尔在车厢里打个瞌睡，也要扣款。如有个叫王福祥的司机，一次在半夜里出差后，疲倦极了，想稍为闭一闭眼睛休息一下，谁知竟睡着了，直睡到天亮才醒。当他慌忙把车子开到总站车库时，老板竟要按照实际出差时间如数交款二十多元。后来托人恳求，最后赔了八块钱才了结。

有时，车子进站放不下，司机只得把车子停在马路旁，等调档再进车库。这时，要是被伪警看到，就要抄号码。第二天，“新衙门”（伪法院）就会来传票，把司机叫去罚款，而祥生老板可以一点不負責任。当时，司机被“新衙门”叫去罚款的名堂，也是多如牛毛，花样百出。如窜了红灯，就要罚五、六块钱，甚至连多掀几下喇叭也要罚款。据说有个司机犯了“新衙门”的所谓“禁规”，来传票要罚他一块钱。当时这个司机因有急事，就借了一块钱托一个学徒送去。这个学徒跑到“新衙门”，他想想气不过，就为这个司机讲了几句公道话，谁知惹怒了“新衙门”的伪法警，说他无理取闹、

捣乱法院，定要罰他十块銀元。

司机出差，倘若碰到美国的烂水手（海軍），就倒楣了。这些烂水手經常的恶作剧，把车窗、座垫、车厢內的設备弄坏，然后扬长而去。倒楣的是司机，又要被扣除車輛設备损坏賠償費。还有，司机經常碰到的是：車輛被碰碰擦擦，如果擦去一些漆，老板就要按照被擦去漆的面积大小，要司机賠償，少則二、三元，多則竟要赔上一二十元，甚至要司机完全赔新的。如汽车叶子板被碰擦，赔的更多。被碰擦的旧叶子板被挂起来，司机称之为挂“火腿”。过些时候，老板又把它拿下来，重新补一补，漆一漆，再換到另外車輛上去。这要赔那要罰，当时司机名义上有工資，实际上很多司机連一半工資也拿不到手，有的还要倒貼給老板。据說，有一次发工資时，去拿工資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因为大部分司机的工資被扣除了还不够抵偿，所以大家都不去拿了。

司机因操作关系，或者忘記加水，或者車輛本身問題，或者与车相撞而造成車輛机械設备的损坏，司机都得賠償，多的几十元、上百元不等。有些司机为了賠償，被逼得家破人亡。有个司机叫丘云来，有一天闖了车祸，祥生老板叫顧問律師去打官司，后来說是官司打輸了，老板要丘云来全部賠償，甚至还要他出打官司的費用。丘云来将自己家里所有的东西卖光，还不够付賠償費。他被逼得无路可走，一

个人偷偷地跑到现在的瑞金二路的一条小弄堂里吊死了。
司机车永才也是因为赔不起二百八十块银元，上吊自尽的。

軟硬兼施

当司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大家就团结起来闹罢工斗争。祥生老板为了分化工人，磨灭工人的斗志，就采取軟硬



司机被迫得走投无路，团结起来闹罢工斗争。

兼施的办法来对付工人，对付司机。

軟的，就是拿出一点經費办“司机同人俱乐部”，用騙、拉、拖的方式，引誘司机到俱乐部去玩乐、賭博。老板的亲信还叫自己的大小老婆住到俱乐部来，聚賭抽头。誰輸了錢，老板的亲信就假装关心的样子，以低利息借給他再賭，結果誰借得多，就輸得多。这样一来，輸錢的司机就无形之間被他們控制了。如有个叫小山东阿四，单身一人，被騙去賭博，向老板的亲信借了不少錢。到了冬天，他身上只穿一套单衣，洗车子时，赤着脚在冰滑的水泥地上走来走去。他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与其他司机一起鬧着要增加工資，老板的亲信马上出来向他逼債，吓得小山东阿四不再說話了。

硬的，就是从打罵直到开除。祥生老板是喜怒无常的，当他不高兴时，就对司机拳打脚踢，拿鸡毛揮帚随便抽人，有时連職員也不能幸免。祥生老板对于那些敢于参加罢工斗争的人，就大批开除。有一次，一下子就开除三十六个司机。有的还被拘捕用刑。如有个姓呂的司机，积极参加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老板就誣告他偷公司的汽油，并賄賂伪警察局将他捉去坐牢。

祥生老板为了对付司机的反抗，除了勾結反动势力，四布走狗爪牙外，还特地招收部分外国侨民作司机，来監視中国司机。如中国司机起来斗争、罢工，要求增加工資时，祥

生老板就故意叫外国司机去出车。

祥生汽车公司老板的罪恶发家史，不就是千百个司机的血泪史吗？

新企业的新风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派来了干部，重新整顿祥生汽车公司，公私合营后，改名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从此，工人、司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领导上对工人、司机各方面都很关心。每年到夏天，早已准备好的凉席、竹榻都已安放在各停车站和公司大礼堂内，好让司机同志安静休息。科室干部还到停车站为司机送毛巾、送消暑的清凉饮料。为了方便做半夜班和路远的司机能睡足歇好，还设有单人宿舍十多处。在党的教育下，司机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决心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在司机中涌现了很多的新人新事。热情主动，体贴乘客，扶老抱幼，抢救病伤，帮助乘客寻亲找友，帮助乘客解决困难，在司机中已形成风气，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赞扬。（任满鑫插图）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道德油厂老板的“道德”

黄浦区粮食局警卫员 周荣隆

资本家常常吹嘘他们是最讲“道德”的，这是骗人的鬼话。解放前，我在中国道德油厂做工，看到和听到道德油厂老板行的是什么“道”，讲的是什么“德”。

黑手起家

中国道德油厂（以下简称道德油厂）老板原来是专收赃物的。当时，他勾结了码头上的恶霸、仓库看守人员以及地痞流氓、伪警等，专门搞偷窃、贩卖赃物的活动，捞了一笔钱后，在一九三二年开设第一号道德油厂。这个走江湖与流氓为伍的人，一变成为油厂老板，榨取工人和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十分毒辣。

道德油厂老板经常对职工说：“我开‘厂’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吃我的‘油’，而我只是吃点‘油脚’，你们要好好地给我干啊！”他用这种模糊职工的阶级意识的手法，要职工

为他做坏事。他差遣职工到处搜集积垢較厚的旧油箱，规定每只重量要在两斤半以上，而一般油箱都是两斤四两（老秤），他搜集来这种积垢較厚的重油箱，充两斤四两的油箱，从中“吃皮捞油”，一轉手一箱油就被他吞掉了四两。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居民的食油非常困难，道德油厂老板认为这是他赚鈔票的好机会。这个厂是經售“戶口油”的，老板連少得可怜的“戶口油”也要捞一票。他特地做了一批“吊提”（代替量具），照规定当时一斤重量是十六两，道德油厂的“吊提”只有十五两二錢，这样，无形中一斤油就少給八錢。更恶劣的是，当职工在为居民拎提灌油时，他站在身边，睁着两只眼睛对职工說：“把吊提側一側、側一側。”这一側不打紧，而居民买回去的一斤油只有十四两左右了。誰要是不遵照他的話办事，事后就要找你岔子，說你对店不忠，輕則痛罵一頓，重則叫你卷鋪盖。道德油厂老板为了私吞居民的“戶口油”，轉手卖黑市赚大錢，常常故意不开店门，推迟卖油时间。有时，只卖了几桶油，就推說卖光了，把压下的油轉手卖黑市。

老板常說：“一百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上一次当，我就可发财了。”因此，他經常弄虛作假，以次充好。如那时他店里經售一种紅香麻油，价格要三十六元一担，而一般生油只卖十五元一担，为了賺錢，老板就在一百斤麻油中掺入五十斤生油。这样紅香麻油被冲得和生油几乎一样，不能充紅



为了赚钱，老板又想出了一条坏主意：用一种红颜料拌和在麻油内……。

香麻油卖出去。这时，老板又想出了一条坏主意：用一种红颜料拌和在麻油内，看起来同红香麻油一样。当时，我们对资本家这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行为非常气愤。

道德油厂老板为了扩大营业，别出心裁地“出产”了一种“道德美酒”。其实，当时老板既没有开设酒厂，又没有加工场，哪能出产什么“美酒”呢？原来老板看到搞瓶装酒卖得出价，赚头好，因此，他把买来的烧酒掺上水，贴上“道德美酒”的招牌，就算是他的产品了。

放“庄”搜刮

在旧社会里，农民身受地主的重重盘剥，他们一年劳动所得的果实，绝大部分都被地主所掠夺，即使剩下一点油料等物，也是为数不多。他们很想拿这些花生、黄豆等油料换取粮食或急需要用的钱钞。就在这时，道德油厂的老板派出他的亲信，到苏北、山东、安徽等油料产区去放“庄”（即设立临时采购站），杀价收购。有不少农民因为手里的豆油和花生油为数不多，如果直接拿到城市出卖，往返路费较多，不很值得，加上又急等钱用，只好忍痛低价卖给他。老板把豆油、花生油拿到上海，囤积起来，当花生、黄豆落市以后，就高价出售。他这样一翻一覆，就赚了很多钱。

老板还开了“钱庄”，专门搜刮附近的女佣人，他以一分、一分二的所谓高息，来引诱她们把每月所得的几个工钱，存到老板的“钱庄”里。老板拿了这些存款去做投机，赚大钱。记得有个常熟妈妈把多年辛劳积蓄的一百块银元，存在道德油厂老板那里。那时，物价一日数涨，纸币贬值，最后把常熟妈妈的一百块银元变得只能买一包香烟。常熟妈妈拿着这一包香烟钱的“存折”，一气，撕得粉碎。而老板拿着人家的血汗钱，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赚了許多钱。

残酷剝削

記得我們剛進店門，老板就向我們宣布了五條店規：

不准留長發；

不准穿白襯衫；

不准回家住宿；

不准穿有口袋的衣服；

不准雙手插入袖子或褲袋內。

另外還加上一條抄身制度。

從頭到腳、從里到外，把我們職工管得死死的。他連我們站櫃檯做生意一雙手怎麼放都作了規定。老板規定職工的双手要八字撐開放置在櫃檯上，不准交叉在身前，也不准放在背後。

道德油廠是一座五層樓的樓房，老板把他自己的住房安在店堂的樓上。他為了監視職工，要職工無限度地為他賣命，還在地板上開了一個大洞。這個洞直對着店堂間，老板和老板娘經常坐在大洞的旁邊，監視着職工的一言一動，稍有不稱他們的心，不是打罵就是停生意。

那時，我們從早到夜勞累一天，做得筋疲力盡，到深夜，倒下就呼呼地睡着了。但是到三四點鐘，正當我們好睡的時候，老板從外面吃喝玩樂回來，到職工睡覺的地方“值差”

来了。老板先跑到学徒的舖前，气势汹汹地叫学徒起身；接着又把职工們一个一个叫醒。当他看到职工都起身到店堂里去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由于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得不到休息，許多职工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很虛弱。誰要是生了病，老板就把他一脚踢开。

苦难生涯

道德油厂新进一个职工，必須經過“三堂会审”以后才录取。所謂“三堂会审”，就是老板的母亲、父亲以及老板夫妻两人都要給新进人員談話、“看相”，要他們三方面都同意了，才可进店工作。

对于所謂违反了“店规”的职工，也要經過“三堂会审”才放你过门，有时还要遭到一頓毒打。

有一天清晨，刚开店门，老板接到他亲信的密告，說一个姓金的学徒拿了一块腐乳錢。老板瞪着眼睛一把揪住这个学徒的头发，不問情由，先是“啪啪啪”几个耳光，然后把这个学徒拖到一个小房間里，关上门痛打了半天，打得这个学徒眼青鼻肿、血流滿面。打了不算，还一脚把他踢出店门，連被头舖盖也不准拿走。有个姓顾的学徒，老板說他卖东西不收錢，将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把这个学徒双手反吊在店堂里的帐台銅栏杆上，一面打，一面罵，以此示众。据

了解，被他毒打后赶出店门、连铺盖都不准拿走的职工就有十多个人。

我们职工成天象牛马般地劳动，但一个月只能拿到两三斗麦子的工钱，后来只能买上几斤油，根本养不活老婆和孩子，经常过着穷苦的生活。但老板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开了四月店、两月酿造厂、三家旅馆，拥有豆油三千桶（每桶三百六十斤）。这些财富都是从工人、顾客身上刮下来的。

资本家口口声声讲什么“道德”，拆穿了，他们宣扬“道德”，只是为了更有利于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汗罢了！（金奎插图）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四十年和十四年

上海邮电器材厂机械工程师 蔡金龙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但我真正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那时开始的。

撫今追昔,忆苦思甜,不禁热泪滾滾。我要倒出解放前四十年中在我心头积存的苦水;我要歌唱解放后十四年来党和毛主席給我的恩情。

苦 海

我生在上海浦东乡下。祖祖輩輩是佃戶,世世代代受欺压,家里没有一个識字的。当我还在娘肚里时,父亲就替我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蔡金龙。我出生以后,父母亲更是把一綫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到我八岁那年,父亲向地主借了十块銀元,让我进了一所私塾念书。哪知道,我在私塾念了一年书,沒有学到什么,家里却愈过愈穷,三天两头揭不开鍋,父亲还不起为我讀書借的“閻王債”。沒办法,父母

亲只好让我退学，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地主家去当放牛娃抵债；我母亲也只得离开家，到上海去帮佣。

这个地主是只“笑面虎”，没开口，先露着焦黄的门牙嘿嘿笑。一天，他把我叫去，脱口喊了我一声，顿时就收住了笑脸，竖起眉毛说：“穷八字，富贵名，啥个‘真龙’‘假龙’？今后不许你叫这个名字。”听了他的话，我肺都气炸了，心想：“穷人连个名字都不能随便取吗？”接着他又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冬天牛吃的草料不够，你白天出去找草料给牛吃，晚上再喂料房里的干草。”说完，他就跑进房内吸大烟去了。

隆冬酷寒，滴水成冰。我裹着一身烂单衣，出外找草料。北风吹在身上象刀割，光着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踩在冰冻的地上，疼得象乱箭穿心。这样的痛苦生活真难熬啊！

快近年关了，地主整日在家吃鱼吃肉；而我却还在外边喝西北风。我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偷偷地从牛棚里拿了些干草烤火，暖和一下身子。谁知这事被地主知道了，他象凶神恶煞般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又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一面抽，一面骂：“小赤佬，你要死了！啥人叫你拿牛吃的草去烤火？老子叫你这条‘金龙’变成一条‘毛虫’！”一顿毒打，把我的脑神经和耳鼓膜打坏了，我昏倒在地上。待我醒来后，地主便

一脚把我踢出了黑漆的大门。

我冒着风雪，眼里噙满了泪水，跌跌撞撞跑回家，却不料母亲也被人家解雇回来了。她看到我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把我抱到怀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半夜里，我浑身象火烧一样，特别是被打坏了的耳鼓膜痛得象针扎，里面“嗡嗡”直响，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滚去。母亲看我痛成这个样子，又抱住我大哭起来。由于无钱医治，我的伤越来越厉害了，整天发高烧、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后来，命虽保住了，但我的耳朵却成了“重听”（听力严重减弱）。

地主的心肠真是狠，把我害成残废还不甘心，见我活了，又逼我再去替他放牛。我母亲不忍心让我再去受罪，就向地主求情，说我已經残废，不能再去放牛了。地主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说：“不回去，也可以；马上还清欠债，算清饭钱！”我父亲被地主逼得无路可走，心一横，把自己起早摸黑开出来的三亩多荒地给地主抵了那笔“阎王债”。

一九二三年，我一家四口都病倒了。父亲染上了瘟疫，臂上又生了一个大毒瘤，肿得比大腿还粗，脓血直往外流，痛得他日夜喊叫。我母亲也病倒在床上，家里连烧粥汤的人也没有。她听着父亲凄厉的叫声，看着饿得皮包骨、病得奄奄一息的我和四岁的小弟弟，泪珠簌簌地往下滚。不久，小弟弟一病夭亡；父亲也因为沒有钱医治，病死了。

父亲死去不久，我的病也加剧，几次昏死过去。有一次，我昏死过去以后，母亲以为我死了，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席把我卷出去，准备把我埋葬在父亲的坟旁。抱到坟边，母亲又摸一摸我，发觉我还有一丝热气，就把我抱了回来。她几天几夜地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破屋中一支残烛，发出幽幽的微光，照着母亲惨白的脸。母亲见我苏醒过来了，惊喜若狂地把我抱得更紧，顿时，我瘦小的脸颊被她的热泪滴湿了。

这次我虽然又死里逃生，但是我的耳朵却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声带也坏了，不能说出成句的话。我就是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摧残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狠 窟

乡下不能活命，母亲就求情送礼把我送到我舅父开的上海金森记五金厂里当学徒。那时，我才十三岁。

天下财主的心是一样狠。舅父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而“另眼看待”；相反，利用我生理上的缺陷，百般地虐待我。记得我头一次煮饭，不当心煮坏了，我舅母——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拧住我的耳朵，伸手就给我两巴掌。打了不算，还不准我吃饭。我只好饿着肚皮去干活。又有一次，我看见朱阿菊老师傅用铜水鑄模子，就走攏去想学点技

术。朱师傅心肠好，他作着样子拿起一杯烧沸了的铜水，慢慢地倒进一只小模子内，一面倒一面吹气，然后交给我一杯铜水。我也照样倒，照样吹气。我恐怕气力不够，就使足了全身力气吹，不料把倒下来的铜水吹在水泥地上，这个模子没有铸成。这件事又被老板娘发觉了。她用双手使劲地擰着我的耳朵，然后又左右开弓打我。我立脚不稳，一头撞在风箱上，差一点跌倒在烧沸了的铜水中。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虐待，就逃了出来，流浪在街头。但是，我接连逃了三次，就被老板抓回去三次，每次都被打得浑身鞭痕累累。逃跑不成，我只得在厂里继续做牛做马。我日夜劳累得不到休息，身体很虚弱。有一天，我从三楼提着一大铜吊开水下来，在下楼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两脚一软，跌倒在水泥地上，右脚背被开水烫得满是泡。狠心的老板娘不但不给我治疗，反而把我锁在鸽子笼似的小阁楼里受罪。三伏天，闷热的“鸽子笼”里充满了臭气，臭虫、蚊子叮得我全身红肿，我的伤口也烂得出了蛆。幸亏朱阿菊老师傅弄了一点豆油给我涂伤口，伤口才慢慢地好了。

我在厂里做了三年学徒，从朱师傅那里学到了一点技术，总想可以满师了。谁知，老板要我拿出四十块银元办“满师酒”，否则还要做三年学徒。天哪！我身无分文，哪有钱办酒呢？结果，只得继续当学徒。一个三年，又一个三

年，一直熬到了第九年，那时我已經有了一手熟练的技术，老板才让我滿师。老板欺我是一个聋哑人，給我的工資只有一般工人的三分之一。真是气人哪！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狼窟”，但苦于沒有机会。后来，这个工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毀了，我才离开了这个“狼窟”。

地 獄

在旧社会，残废人到处受欺凌。我离开了金森記五金厂后，又先后到过四家工厂做工，受尽了剝削和压迫。記得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半年工，結果沒拿到半分工錢，气得我病了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被騙子騙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办的一家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都有我們的同胞被无故毒打。我是一个聋哑人，遭受的苦难，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防止我們工人反抗，规定各车间工人不能相互走动。我不懂这个规矩，有一天，无意走进了另一个车间，看见一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輪里去了，我急忙飞步向前，用左手拉机輪，救下了那位女工，但我的左手腕却被削去了一大块肉，当场就昏倒在血泊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謾說我是“密探”，把我抓起来拷問了一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这个工厂。我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总会对中国工人好一些。其实，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刚接收工厂不久，厂里一些工贼混水摸鱼，大量窃卖厂内器材，肥私饱囊。我当时耳朵听不见，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有一次，我拿了一小卷旧带，想做裤腰带，那些工贼就乘机嫁祸于我，诬赖我是“大盗窃犯”，把我毒打一頓，硬逼着我这个聋哑人招“口供”。我是个聋哑人，有冤说不出。他们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以后，又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监牢。我在牢里，浑身生满了疥疮，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我才从牢里逃了出来，在外过着流浪生活。

翻 身

一九四九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得到了新生。我这个在旧社会中受人歧视的聋哑人，从此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当时在交通部上海电讯局修配所工作，一九五二年调到上海邮电器材厂），领导上对我非常关心，处处照顾我，时时帮助我，使我能顺利地克服了因生理缺陷而带来的种种困难。就在一九五〇年，我在厂领导和工人帮助下，改进了电报机内一个零件——“梳齿梗”的制作方法，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党的恩情似海深。我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身体很虚

弱，党就送我到杭州去休养；党还千方百计为我治疗聋哑，一九五五年，我去北京开会，邮电部负责同志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疗。虽然医药不能再治好我的残疾，但这件事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

一九五八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组织上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视的聋哑人，也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怎能不叫我激动、高兴啊！

那一年，厂里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大闹技术革新。为了使电传机能成倍地增产，我们尝试制造一副复杂的“压铸模”。过去，这种模子是经过泥坯翻砂后制成的，工效低、质量差；这次要求造出的一副模具，直接用金属溶液浇铸，这在新中国邮电事业中还是第一次。厂领导经过研究后，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鼓励下，我毅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制造过程中，党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压铸模”造成了。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我和上海市二百九十多位先进生产者在上海电机厂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但我说不出来。我只能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我对毛主席深深的敬意，来表达我内

心所要說的話：敬愛的毛主席啊，是您解放了我，使我擺脫了舊社會的折磨和摧殘，過着幸福的生活；是您培養了我，使我這個受盡凌辱和欺壓的聾啞人成為新中國的工程師。這海樣深的恩情，我怎樣來報答啊！

我感到黨和人民給予我的榮譽和獎勵太多了，而我給黨和人民所做的事却太少。今後，我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人殘廢，心不殘廢，一顆紅心永遠向着黨！”這就是我的誓言。

（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

《四十年和十四年》的寫作經過

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旬，蔡金龍同志看到了本報的徵文啟事以後，又激動、又着急，他心里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激動人心的事要寫；可是，自己既不會說，又不會寫，本單位又沒有懂得聾啞人語言的代筆人。怎麼辦？他着急了半天，最後，他請一位青工代他打了個電話，把在東方印花廠工作的王光匯同志請了去。王光匯同志一度也是個啞人，後來，人民的醫生幫他醫好了病，他又能講話了。王光匯看到了

蔡金龙,知道蔡金龙有一肚話要吐露,就一口答应他,让他用手势讲话,自己代他写出来。他们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合作写成了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

編 者

两代碼頭工人

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作业区副主任 徐錦万

我和我的父亲都是碼頭工人。我的父亲从一九一〇年他二十二岁上碼頭抬杠棒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他四十七岁死在碼頭上，被杠棒整整压了二十五年。我从十八岁起上碼頭，一直工作到现在，今年已五十一岁了。在旧社会，碼頭工人中間有句俗話：“好汉难养三张嘴”。当年，碼頭工人都是“临时工”，做一天工，拿一天工鈔；而且要 and 把头“二八”拆賬：十个銅板的工鈔，把头拿去八个，工人只能拿两个。因此，不要說沒工做，即使有工做，累死累活干一天，得了几个錢也只能买几块大餅。我父亲刚从老家苏北高邮到上海浦东十八間碼頭当“苦力”的时候，我已經有两个弟弟，再加上父亲、母亲，全家一共是五口，光靠父亲一根杠棒，是無論如何也养不活的，所以，母亲只能給人家帮佣。可就是这样，也仍然填不飽一家人的肚子。我家每天吃的都是六谷粉做的稀糊，有时还放上一些我們兄弟三个拾来的烂菜皮。我們住的房子更不用說了，在碼頭外边，用几根毛竹搭

了一个还没有一个人高的草棚棚，进出都得弓着腰。落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下（茅草滴水）。因此，我家里几乎长年都是湿漉漉的，我们身上都生着疮；生疮又没钱买药，我们弟兄三个，常常痒得哭。父亲听见了，总是骂我们：“哭死呀！生疮有啥难过，我在码头上扛煤才是受罪哩！”

讲起我父亲在码头上扛煤炭的情况，那真是惨啊！当时码头上没有一件机械，上下全得凭一根杠棒、两只肩膀。卸煤的时候，从船舱口到码头上的煤炭堆，都用不到一尺宽的跳板搭起来，随着煤堆的坡度，一节节高上去，最高时有三四层楼高。工人们就在这狭窄的跳板上来回奔走，把煤炭一籬一籬扛上来，每人每天至少要扛三四百籬。跳板又狭又软，搭得又高，一不小心跌下去，就没得命了，所以工人们都叫它“奈河桥”。当时，工人中还流行一首歌谣：“奈河桥呀奈河桥，扛着煤籬桥上跑，跑过桥来一块饼，跑不过桥命送掉。”意思是说，码头工人为了挣一二块大饼的钱，每天要冒着送命的危险。扛煤的时候，跌死人是常有的事啊！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爹回家来，他眼角上挂着泪珠。哭啥呢？原来，那天他有一个同伴因为跳板滑，摔下去撞在水泥地上当场跌死了；他家里还有老婆和四个孩子哩，连收埋他要买几块芦席的钱也没有，真惨哪！我问道：“难道把头就不管吗？”“把头也管这！”爹看着我：“码头上规定，生死

存亡各自負責。你大伯(指那个摔死的碼頭工人)老婆領着孩子哭得死去活來，把頭不但沒摸出一個銅板，還踢了她幾腳。真是，‘把頭，把頭，吃人不吐骨頭’啊！後來，還是大家湊了點錢，才把人埋掉。”說到這里，爹又難過得流淚。我們听着听着，也哭了起來。從此我們一家對爹去走“奈河橋”扛煤炭，心里就更加不安了。每天天不亮，爹起身的時候，我們兄弟也就都爬起來。爹腰里纏着搭肩布，肩上扛着杠棒出門的時候，媽媽總是小聲地叮囑着說：“孩子他爹，你……你千萬小心點兒喲！”我們弟兄三個，有的抱着爹的腿，有的牽着爹的手，一個個仰着頭，也一聲聲地喊着：“爹，爹……”

我父親个子矮，體力弱，一天扛下來，常常蹲在地上老半天站不起來。由於過度的勞累，吃得又差，後來他就得了癆病(肺病)，人瘦得皮包骨頭。可是為了生活，每天一清早，他還是得揹着杠棒去走“奈河橋”。有時，母親看他實在太累了，就流着眼淚勸他說：“孩子他爹，你……你就在家歇一天吧！”父親也流着眼淚，指着我們說：“虧你說的，難……難道大家都封上嘴嗎？”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我從十八歲起，就經常上碼頭做小“野雞工”，可是，家里的生活，主要還是靠父親掙錢來維持。他不去賣命怎麼行呢？

我二十三歲那年，父親終於口吐鮮血死去了。臨死的時候，他把我們叫到床前，泪流滿面，聲音嘶啞地對我說：



“碼頭……碼頭……是吃人的地方啊！……”

“孩子，我……我不行了，你也不小啦，我沒啥交代。最……最要紧的是，三百六十行，你行行都可以干，就是不要再干碼頭这一行。碼頭……碼頭……是吃人的地方啊！……”

我眼泪簌簌地直往外淌，刚說了声：“爹，你放心，我都記住了……”我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父亲死后，全家的生活担子就都落在我肩上。我想另外找个职业。可是，从浦东跑到浦西，再从浦西跑回浦东，一点工作也沒有我做的。做买卖吧，沒有本錢；进工厂吧，又沒門路。最后，实在沒有办法，我只得仍旧到碼头上去做苦力，扛煤炭。

在旧社会，碼頭工人真是难当啊！把头根本不把我們当人看待，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在我常常做工的新华碼頭

上有一个把头叫吳良启。这家伙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工人们都喊他“小冬猪”。工人们没有一个不恨他。他对工人有“三打”：第一，看见他不低头打招呼的要打；第二，脚步走得慢一些的要打；第三，下工前要打。几乎没有哪一天没有几个工人不被他打，特别是这第三打最毒辣。工人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天，好容易熬到下工，眼看可以拿几个血汗钱。这时他就来了，故意找岔子，拿着杠棒皮鞭乱打。工人被他打得跑开，这样他就借口你离开码头，这天的工钱就全部进了他的腰包。有一次我正在背“火硝”，背到半路，碰见了。我刚要向他点头招呼，他就抓起一根杠棒打了过来。我不知怎么回事，想要开口，他也不听，还是追着我打。没办法，我只好将肩上的货包撂下，逃出码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存心要吞没我这一天的苦力钱！

那时候，资本家和把头把我们码头工人的性命，看得比狗也不如。有一次我在龙华日晖港码头扛一块大钢板，两吨多重，十二根杠棒，二十四个人扛。刚上肩，走了没几步，由于用力过猛，我忽然觉得下身什么东西直往下坠，眼前金星直冒。我实在吃不消了，可是因为怕出事故，不敢往下放。我一边顶，一边对监工的把头说：“我下身小肠气发了，吃不消了，让我停下来吧。”把头瞪着眼骂道：“他妈的，哪来这么多罗苏！死不了，不准停，往前走！”我再哀求，把头就说：“你要歇可以，二十三个人的钱都你付。”想想吧，我能付得起二

十三个人的工鉗嗎？我只能咬着牙，死拚活撐地扛。到了目的地，我一倒下就爬不起来了。

这就是解放前我們碼頭工人所过的生活！

过去，我时常想：哪一天我們碼頭工人才能出头？

出头的日子终于盼到了。一九四九年，党把我們从苦海里解放出来。压在我們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我們碼頭工人第一件大喜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封建把头，成了国家企业的正式职工，結束了“野鸡工”的生活。发服务証的那天，許多碼頭工人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我还把服务証用一块紅布包着，放在貼胸的口袋里，一天要拿出来看几遍。我感觉到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感謝党，感謝毛主席，我觉得我应当努力工作。

我在生产上刚刚做出了一点点成績，党和同志們就給了我极大的荣誉和信任。一九五三年第一次普选时，我就当选为当时的浦东县东昌区人民代表（现在是杨浦区人民代表）。当时，我的那个心情呀，真象俗話說的“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不知从何說起。解放前，我們碼頭工人是最最下等的人，有錢人看到我們都要捏住鼻子，嫌我們身上的汗臭。如今，我們碼頭工人却能够經常和区委書記、区长等領導同志坐在一起，商量全区的大事……我愈想愈感动，真想高呼三声“毛主席万岁”！所以每当区里的領導同志問起我們碼頭工人：“有什么困难，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就代

表全体同志回答说：“比起解放前，那现在真是太好啦。我们什么困难也没有，就是工作做得太少啦！”

我们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还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一九五八年，党领导我们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此，千百年来压在我们肩上的杠棒、绳子，一下子就都丢掉了，绝大部分装卸操作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是我们码头工人的第二次解放啊！我们码头工人编了这样一首歌：“包子上楼不用夯，煤炭上山不用筐；不靠天来不靠地，全靠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由于党的教育，我们码头工人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为祖国争来了荣誉。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今年七月十日从西德来了一条“胜波塞儿”号轮船，靠在我区其昌栈码头。这条船是第一次来中国，一靠好码头，船上就将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连过道的门都锁上了。当时天正热，我们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船长告诉我们，船上有很多东西，不会被人偷去吗？我们笑着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工人决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不相信，还是日夜派人轮班守望。可是，一夜过去了，出乎他们意外的是，连他们放在外面茶桶里的开水都没有人去喝一杯。第二天他们就将岗位撤了，但门窗仍然没有开，有意将一些不太值钱的棕绳木板丢在甲板上。又一天过去了，这些东西谁也没有去碰。这下他们相信了，将门窗统统打开。开航时，我们问他们有没有

少什么东西？船长摇摇头，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你们新中国的码头工人是这个。了不起！”

看到码头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化，我常常这样想：“爹，要是你能活到今天多好啊，如今，做一个码头工人才真幸福哩！”（韩敬插图）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

党帮我革掉了“黄連命”

上海国棉十二厂二紡工場工会副主席 王小妹

我刚从娘胎里掉下来，算命瞎子就說我时辰八字不好。我娘和奶奶也常常唠叨：“苦命呀苦命，生来就是黄連命！”在旧社会，我三十多年的生活，也的确的确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家乡在苏北邵伯。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受苦人。祖父是給地主打零工的。家里沒有房屋，沒有土地，全家老小，都挤在一只破烂的小木船上过日子。我父亲有四个兄弟，苦难的生活逼着他的大哥出家做了道士，一家人落得四分五散。娘生我那年，乡下正鬧灾荒。奶奶指着我唉声叹气地說：“这伢子呀！挑了这种苦年头来投生，又偏偏投在我們这种穷人家，沒得吃、沒得穿，真是黄連命啊！”不久，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只得挑起一副箍桶担，带着我和母亲出外逃荒。一路上，一面修桶补桶，一面求乞討飯，流浪了两年，才到了上海。那时，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我們穷人連吃口飯也是难上难的。我爷天天鸡叫出门，天黑回家，

挑着箍桶担四处寻活；我娘也日夜帮人家洗洗补补。但是，一家三口，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不久，娘生了我妹妹，无法再去帮人家了，生活更加困难。娘就常常怨我们，说我们“命里注定”要受苦。可是，我很小，懂得什么呢！肚子饿了就吵着要饭吃。由于生活逼迫，我才长到四五岁，就拎了一只小篮头，三脚高两脚低地到黄浦滩边、垃圾堆里，去拾煤炭了。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托人把我送到一家缫丝厂去当童工。这家厂有五六百个工人，一半是八岁到十二岁的童工。进了这家缫丝厂，就象进了人间地狱。车间里蒸气腾腾，就象大雾天，一股热气熏得人发昏。不到一会功夫，浑身就湿漉漉，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水蒸气。我们童工做的生活，又累又苦，天天站在灼热的炉子前，双手不停地在开水锅中捞丝头（蚕茧）。我们这双手，怎能经得起开水烫啊！一天十二小时下来，两只手烫得通红，象剥了皮似的。我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娘帮我涂上一层明矾水，用布包扎起来。第二天，又得解掉包布，忍痛上班。

做工的时候，工头时刻站在背后监视着我们。我们生活做得稍慢一点，或者丝头粗细抽得不够匀称，工头就拿滚烫的开水朝我们泼来，我们的脸上、手上，顿时烫起了一个个水泡。挨了打，挨了烫，还不准回一句话，也不准哭；不然，工头又要一把抓住我们的辫子，绕在自来水龙头上，用

撈蚕茧的銅錘子，渾身上下亂打，邊打邊罵：“你還凶！賤貨！”要是我們不當心出了些差錯，那就沒命了。工頭就會抓住我們的手，用頭髮杆子戳我們的手指。俗話說：“十指連心”，那個痛啊！痛得我們呼天叫地。但你越是叫喊，工頭越是戳得凶，直戳得十指鮮血淋淋，痛得暈過去了，才肯罷休。可是醒過來，還要硬逼我們勞動。皮開肉綻的手指，浸在滾燙的開水中，怎麼受得了啊！

我在繅絲廠做了三年，碰到一次大罷工。工人們實在不堪忍受殘酷的打罵，提出了改善勞動條件、不准打罵工人的要求。我心里多高興啊！但是，老板真狡猾，他把工廠关了。我們都失了業，我也只得回家。後來，父親又托人把我送到一個資本家家裏去當了頭。那時我才十三歲，要服侍老板家大小十一個人。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來燒早飯、劈柴、洗衣服，晚上，還要給老板洗腳，安頓他上床，一直要忙到半夜，我才能睡覺。我那時扎着辮子，但一天到晚忙得連頭髮也沒空梳，老板一剪刀把我辮子剪掉了，好讓我騰出梳頭的工夫來服侍他們。我人小力氣小，一天睡不到幾小時，常常累得頭昏眼花。有一次，在劈柴時，一刀下去把手指劈掉了小半只。我怕解雇，暗暗用手捏住，不敢聲張。後來老板知道了，不但不憐惜我，反誣我“偷懶”，“活該”！一九三一年“一·二八”戰事爆發，那個資本家逃難去了。我回到家裏，娘擔心今后的生活，說我命苦。我小小的年紀，雖然還

不懂得什么命不命都是算命瞎子編出来的，但是，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十四岁时，我到英商“老怡和”紗厂去学搖紗。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在“老怡和”，我还是照样遭受資本家的剝削。明里讲是每周工資三元，但中間要被工头扣去一元四角，实际上每周只得一元六角，只能买到几斤米。我在这家厂做牛做马做了三年，連双胶鞋都买不起。下雨天，为了不使脚上仅有的一双破布鞋湿掉，在寒冬腊月，也只好赤着脚。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尺多深的雪，我光着脚走到家里，两脚已冻得青紫，媽媽連忙用棉被把我双脚裹起来，一直裹了大半夜，才漸漸感到一陣陣麻木和疼痛。

在“老怡和”紗厂，工人每天劳动十二小时，連吃飯時間也沒有。餓着肚子干活怎么行呢？我們工人上班时，都拎一只洋鉄罐頭装着些飯（其实大多是些烂菜皮），进厂时偷偷地带进来，肚子餓了，趁工头不在时，就把冷飯塞进肚子里。有时，不幸給工头看见了，工头就边罵边搶，連飯帶罐頭摔掉。有一次，我們工人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欺凌和压迫，就起来罢工。英国資本家一个电话，叫来了許多巡捕，把我們都抓了起来，押到一个大楼里关了一个星期。等到释放出来去上班时，才知道我們全被开除了。

失了业，我四处奔波，跑遍了半个上海，还是找不到一点工作。这时候，我娘又怨我命苦，說我連討口飯吃也討不

着。后来，总算听到一个小姊妹讲起，公大紗厂（现在的国棉十九厂）要招工。那时我家住在虹口药材街，离公大紗厂很远，我便和爷娘商量，打算去包工头家寄宿吃包飯。爷娘舍不得我，但是不去又怎么办呢？他们东拼西凑，把家里仅剩的五十个銅板交给了我。我只拿了十三个銅板，买了一块肥皂，几张草紙，拾了一只破包裹，噙着眼泪离开了爷娘，离开了家。

我又跌进了另一个火坑。吃“包飯”，表面上看起来，比“包身工”好一些，但是，我們在包工头的欺压和盘剥下，遭受着和包身工同样的苦难。开头几个月，我每月工資是五元二角，可是每月付包工头的飯錢却要七元。我拚着性命干了六个月，反而欠了包工头一笔債。

不久，我生了瘧疾。这种病要在现在，根本沒啥了不起，往医务室一跑，吃几粒药片，就好了。可是当时，哪来錢求医吃药啊！生了病，只好听天由命。这场病一直拖了两个多月，才漸漸好起来。病好了，工厂早已把我开除了。

我被开除了，欠包工头的債还不出，包工头怎么会放过我呢？为了要我繼續給他卖命挣錢，他就重新把我弄进了工厂。那时，我不懂得我們工人为什么受苦，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苦难。和我一道吃包飯的小姊妹，其中有些人受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吃了长素。这时，她們就来劝我說：“前世不修，今世吃苦；今世不修，来世更苦。小妹，还是修修来

世吧！”于是，我也跟着吃起素，烧起香来了。从此，我一年到头，只穿件蓝布褂子，头上梳了个老太婆梳的发髻；宁愿饿着肚子，也要省下钱来买香烛。每天清早起来，就给观世音菩萨叩上一百零八个头。可是，菩萨是个泥塑木雕的东西，哪里会“保佑”我们啊！隔了两三年，“八·一三”战争爆发了，我们全家逃往乡下。谁知在路上，我爷被日本鬼子的炸弹震伤，回到家里就死了。丢下我娘和姊妹兄弟八人，无依无靠，怎么活命呢？没办法，只得又到上海来。我和几个大的弟妹，去帮人家做佣人、当了头；小的几个，出去拾点菜皮、破烂，一家的日子，过得更凄苦了。

在旧社会里，我是如此痛苦，我的孩子就更不幸。解放前，我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大姑娘一出世，就背在我背上东奔西走，受尽了千灾百难。记得淪陷时期，有一次，我背着孩子到郊区去贩米糊口，冒着生命危险去钻铁丝网。不巧，被日本侵略军发觉了，他们边打枪，边挥舞着刺刀，向我们追来。我没命地四下乱奔。我背上背着孩子，腰里缚了一斗米，手里还抱着一斗米，跑也跑不快，急得只好向乱坟堆里钻。我在坟堆里躲到半夜，才摸黑爬了出来。孩子跟着我日晒夜露，风吹雨淋，经不起折磨，四岁时生了一场病，两只眼睛瞎了。三姑娘得了传染病，没钱看医生，虽然没死掉，也瞎了一只眼睛。第二个孩子在乡下的时候病死了，第四个孩子是在逃难回乡时死在船上的。

“吃奶的孩子离不开娘，田里的五谷靠太阳。”共产党就是我的娘，毛主席就是红太阳。上海解放了，我们工人翻身了。解放后不久，党就送我到工人政治训练班去学习。在党的教育下，我就象是一个瞎子突然睁开了眼。解放前，我们劳动人民受苦受难，哪里是什么“命”不“命”，完全是因为受三大敌人的压迫，是因为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如今生活过得好，这是因为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打垮了三大敌人，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在政治训练班里开戒吃了荤。我下定决心，要做党的好儿女。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党又送我到干部学校学了一年半的文化，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还培养我当了工会干部。一个“苦命”人，成了工会干部，变化是多么大啊！再看看我的孩子，瞎眼的大女儿，由于享受劳保待遇，经过医生的诊治，已经重见光明了；三女儿身体也大大好转了。特别是解放后生的孩子，都长得活泼可爱。如今，我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幸福！

是谁帮助我革掉了“黄连命”？是谁给我们穷苦人带来幸福？是党，是毛主席！我一定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革命到底！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

从工人的手看两个社会

上海机床鋼模厂青工王存柏断手再植成功的消息发表以后，天津制灯厂老工人王福元写了一封信給王存柏。王福元在旧社会被机器轧掉了九个指头，到头来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他在信中訴述了自己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后說：“我們两人有着同样的劳动的手，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我們的经历却有天地之别。想一想旧社会，看一看新社会，我們更觉得咱們这个社会有多么好，心里更亮堂！”王存柏同志在接到王福元同志的来信以后，写了一封回信，述說了自己在負伤以后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人民医生的精心治疗的经过，他在信中說：“是党救活了我的手，是党給你这位残废的老人恢活(复)了青春，回到了工厂。我們都是属于党的。我要永远歌頌党，跟着党走。”这两封信，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訴，是对新社会的热情贊歌。

旧社会吃掉我九个指头

王存柏同志

亲爱的阶级兄弟：

你好。

我是天津制灯厂的一个工人，今年五十八岁。在旧社会，我的十个指头被机器轧掉了九个，成了残废。可是，你呢，被机器轧断了一只手，在党的关怀下，却很快就把断手接起来，重新有了自己的双手。我羡慕你，我祝贺你；同时，也想起了我自己的双手……

四十年前，因为在家乡没法生活，我来到天津“三条石”的“三合成”铁工厂当学徒。受尽了牛马苦，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师。但是，受苦受累并没有到头！不久，资本家用工人的血汗钱买了一台机器，开始生产大桅灯。那时，机器是稀罕物件，没有人会使，掌柜的却硬叫我上机器干活。我不会，也怵头，但是为了保住这个破饭碗，只好硬着头皮干去。

掌柜的为了多赚钱，拿这台机器当宝贝，又怕人看，又怕人学，就把我锁在一间黑屋子里干活。一锁就是一整天，喝的是凉水，吃的是干饽饽，就跟坐监狱一样。每天，我下班出来，伙伴们就跟我开玩笑说：“你出狱了。”

我不懂机器，本来就提心吊胆，加上屋子黑、又闷气，干起活来特别不得劲。没干上一个月，右手的大拇指就让机器砸了。工人出了工伤，掌柜的根本不放在心上，叫我上石桥一家药铺瞧了瞧，上点黄药膏，弄点毛头纸一缠，就算完了。过了几天，手指就烂开了，象钻心那样疼。再找医生一瞧，说是得把手指连根剪掉，要不，连胳膊也保不住。无奈，只好剪吧。那时，哪里有什么麻药？那个医生拿出把生锈的剪刀，照着我手指就是一剪子。剪子一下去，我就疼得昏过去了。等我醒来，大拇指已经没了。伤口疼得我满处乱转，有时忍不住用头顶墙，把头发都顶下来。这种疼痛难忍的日子，我一直熬了半个多月。我的手还没完全好利索，掌柜的就逼着我上机器干活。那时候的机器不比现在，哪有什么安全设备，干活要用手托，成天两只手总在模型里边来回转悠，怎么也保不住不砸手。结果，三托两托，又把手指切了。

第三次上机器以后，我发觉机器的响声不对，有毛病了，我跟掌柜的说，让他叫人修理。掌柜的不但不管，反说我“多事”。我也就没有再提。没过多少日子，我的手又叫机器砸了，这回砸的比头两次都重。

这回砸手以后，挎着个胳膊，什么也干不了，连上厕所扎裤腰带都扎不了。我越想越难过，来的时候是两只手、十个指头，干了不到四年，只剩下四个手指头，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掌柜的满脸堆笑地对我说：“老王啊，别难过，你是

这厂子的老师傅啦，只要有‘三合成’一天，就有你一天！”为什么掌柜的对我說好話呢？原来，这几年，掌柜的发了財，由一盘机器发展到几十盘机器，徒弟多啦，他用得着我那苦苦摸索来的技术啊！

以后，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我又砸了三个手指头。我一双手，只剩下一个好手指了。这时，徒工們也能自己干活了。掌柜想一脚踢开我，但話又不好直說，他就繞了个弯子說：厂里已經訂了个新规矩：工人每天早上六点上班。早十分钟、晚十分钟都不开厂门。那时候，学徒都住在厂里，职员不在这规定之内，这条规矩不就是冲我来的嗎！我一听，肺都气炸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按他的“厂规”办吧。第二天，月亮还老高呢，我爬起来就往厂子里跑。到了厂门口，一問，才三点。我求门房让我进去等会儿，门房不敢作主。我只好门口等着。这时，正是三九天，寒风刺骨，我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袄和一条破夹褲，还光着脚，冻得我来回小跑取暖。后来，实在抗不住了，只好回家去。等我再回来，已經过了十分钟，又不让进去啦！就这样，来早了不行，来晚了更不行，弄得我一个星期沒上班。这一来，經理（就是原来的掌柜）可得了理啦，他把我叫了去，见面就怒冲冲地說：“你怎么一个星期沒来上班？我怎么得罪你啦！”不等我开口解释，他又說：“我看你是不想在这里干了，咱們就新鮮新鮮吧！賬房，給他算賬！”說着，一

甩袖子走了。

我一听，犹如晴天霹靂，气得我一双残废的手直打哆嗦，牙齿也咬得咯咯响。我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去！可是，别人劝我：“上哪儿说理去？他有驻厂的律师，警察所所长又是他的把兄弟。你还是另找生路吧！”就这样，我给资本家卖了十几年的命，养肥了他，到头来，落个残废，被他一脚踢出了大门。

回到家，我愁得几宿没睡着觉。资本家给的五块钱，没几天也快花光了。一天半夜，我把老婆叫醒，说：“他娘，你明天回娘家吧，让你爹娘另给你找个好主儿，别跟我受罪了……”她一听，就哭成个泪人。

同院的穷哥儿刘小三知道我的遭遇以后，给我出了个主意：把他租的洋车，借给我拉，他拉早，我拉晚，还不要我交车份，我这才算有了个吃饭的门路。可是，没了九个手指，拉“胶皮”也不易啊，手擦不住车把，后来还是用根旧麻绳，一头拴在手腕上，一头套在车把上，才算对付下来。

解放以后，我这残废人才熬出了头。我重新回到厂里，党给我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又给我调整了工资，生活上处处照顾我。党给我的好处，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亲爱的同志，我们两人有着同样的劳动的手，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我们的经历却有天地之别。想一想旧社会，看一看新社会，我们更觉得咱们这个社会有多么好，

心里更亮堂!

好兄弟,让我们一起高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祝你用复活的手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

天津制灯厂工人 王福元

新社会使我断手复活

敬爱的老前辈、老师傅

王福元同志:

感谢你,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在来信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使我更具体地感受到旧社会劳动人民深受的苦难,也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新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幸福。

是的,你在旧社会的遭遇和今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新旧两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同!在旧社会,你进工厂当学徒,“受尽了牛马苦”;满师以后,“受苦受累并没有到头”,成天锁在一间“监狱”似的黑屋子里为资本家卖命。你“给资本家卖了十几年的命,养肥了他,到头来,落个残废,被他一脚踢出了大门”。而在新社会,我们年轻人一

进工厂，党和老工人就处处关怀我们、教导我们，要把我们培养成为红色的接班人。我们厂里很多机器都是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由国家投资新添的，工厂领导为了保护我们工人的安全，又在每台机器上安装了防护罩和安全设备。我们的车间空气流畅，光线充足。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工人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都为我们自己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在工作；而他们，我们的阶级兄弟也在为我们工作，时刻在关心着我们。我的断手复活，就是一个明证！

敬爱的王师傅，我的右手是在今年（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早上被冲床切断的。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自己工作时粗心大意，做了一个不应当做的动作。事故发生后，周围的工人同志马上扶着我，带着我的断手，送上三轮车，护送我上医院。一路上，三轮车工人同志就象身上着了火，不断高喊：“工伤！工伤！让开！让开！”一个劲地紧踏猛蹬，向前冲去；交通民警也迅速地把红灯变作绿灯，让我们一路无阻，尽快驶向医院。到了医院，我好象进了我们工人自己的家。医院党总支和行政领导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进行抢救。急诊科的护士同志一面很快通知值班医生，一面替我止血、包扎后送进手术室。断的是我的一只手，而伸过来的却是几十双温暖的阶级兄弟的手。照惯例，象我这样完全断离的手，只能缝合残肢，然后装一只假手。可是医生同志

們知道這是一隻工人的手，就毫不猶豫地說：“想辦法接上去！”這麼一句話，在我聽來是多麼感動呀，這句話里充滿着多麼溫暖的階級兄弟的情誼呀！手術後，醫生和護士們日日夜夜地守在我的身邊，觀察我的手的變化，他們為我這隻手的腫脹而焦慮，為我這隻手的好轉而高興。深夜，我看見醫生和護士同志們還忙忙碌碌地走來走去。我還聽說醫生連做夢都想起這隻手，甚至有個醫生還推遲自己的婚期。工廠領導和工人同志們天天來探望我，安慰我，還替我送來了《毛澤東選集》和有關學習雷鋒同志的書籍，廠工會還替我安排好家里的生活。這一切，怎麼不叫我感動呢？

我在醫院里得到了最大的關懷和良好的治療。醫院請了上海著名的外科專家來會診。醫院里的內科、外科、理療科的醫生和護士同志們都為我這隻手付出過辛勤的勞動。這對一個普通工人來說，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這一切，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才能出現。

最使我感動的是黨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中共上海市委和衛生部的負責同志以及其他部門的負責同志，曾經多次來探望過我，囑咐我要好好聽醫生的話，加強鍛煉手的功能，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爭取早日用自己的雙手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服務。所有這些教導，我將永遠牢牢記在心头。

老師傅，常言道得好，曉得過去的苦，更知今日的甜。我

一直記住一位老工人對我說的話：“王存柏呀，如果你這次事故發生在舊社會，就不堪設想啦！”是的，正是這樣。雖然我年紀輕，今年才二十七歲，是在新社會里成長的，沒有經受過老工人在舊社會經受過的壓迫，但是，我聽過許多老工人的回憶，心里是十分明白的。讀了你的來信，使我再一次

老師傅：是黨救活了我的手，是黨給你這位殘廢的老人煥活了青春，回到了工廠。我們都是屬於黨的。我是永遠歌頌黨，跟着黨走。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用我的雙手為社會主義添磚添瓦。現在，我正在加緊鍛煉手的功勳，爭取早日回到生產勞動崗位上去，同時，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把自己鍛煉成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去报答黨和毛主席的恩情。老前輩，讓我們一起高呼。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最後，敬祝你

在毛澤東的陽光下越活越年輕！

上海機床鋼模廠書工王存柏

王存柏的親筆信（部分）

受到教育。

你信中說：“我們兩人有着同样的劳动的手，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我們的經歷却有天地之別。想一想旧社会，看一看新社会，我們更觉得咱們这个社会有多么好，心里更亮堂！”老师傅，你說得对极了。新旧对比，忆苦思甜，归根結蒂，是因为有我們的党，有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有我們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我們的今天！

老师傅：是党救活了我的手，是党給你这位残废的老人恢活(复)了青春，回到了工厂。我們都是属于党的。我要永远歌頌党，跟着党走。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用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添砖添瓦。现在，我正在加紧鍛炼手的功能。爭取早日回到生产劳动崗位上去，(王存柏同志现在已回到生产劳动崗位上了。——編者)同时，一定要繼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把自己鍛炼成为又紅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老前辈，讓我們一起高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最后，敬祝你

在毛泽东的阳光下越活越年輕！

上海机床鋼模厂青工 王存柏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

两个社会制度 两种店員生活

西藏南路协大祥綢布店 盛祥云

今天的青年人真是幸福。出了学校大门，可以升学的继续升学，該就业的就分配他們工作。

就业的青年，不論到外地农村也好，参加边疆建設也好，还是分配在本地各条战綫工作，都会受到所在单位的领导和老社員、老工人的热情关怀。

可是，在旧社会就不同了。那时候，工作被称为“飯碗”，非經多番奔波、說情、送禮，你就休想把“飯碗”弄到手。即使弄到了一只“飯碗”，要想保住也很不容易。一年之中逢到端午、中秋、春节三个节日，就有卷鋪盖敲破“飯碗”的危险。

就拿解放前西藏南路的协大祥來說吧。它是一家七开間门面的大布店，金字招牌，全国聞名。我在一九三八年，托人求情，进去当了一名“理貨員”。記得当时介紹人对我說：“祥云，找这样一只‘飯碗’可不容易啦！多少人挽亲說情，还是謀不到。你能进得去，真是‘运气’。今后你可要好

好努力啊！”是的，当时我感到自己真是“幸运”，同时也对介绍人感激不尽，至于他说的“你可要好好努力”这句话，当然更是牢记在心了。

条条“店规”如锁链

还在进店之前，我就已经送过铺保了。进店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约摸九点多钟，刚刚打烊上好排门，资本家就吩咐下来，叫我阅读“店规”和补办填写就职志愿书的手续。志愿书上写着：“具志愿书人……忠勤服务，对于贵号所订之‘店员规例’，兹已详细阅悉，誓愿全部遵守，……”这就是说，要我保证遵守“店员规例”。于是，我捧住“店员规例”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越看心情越沉重：它一共有一百七十七条，每一条规定就象一条锁链，把店员紧紧锁住。其中，除了第一条“本号全体店员皆有绝对服从经理之义务”外，违反了要开除的有二十条，要重罚或罚款的有五十八条。一句话，店员是没有人身自由可言的，这真叫人怎么干得下去呵！可是，这只“饭碗”，我好不容易才弄到手，怎好丢掉呢？我硬硬头皮填写了“志愿书”。

解放前有句俗话：“柜台三尺高，好比坐监牢。”那时的确是这样。我们店员的工作、生活处处都要受到无理的管束，按“店规”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我们店员打烊后外出的时

間，每個月累計不得超過五小時，超過了就要扣工資。而且晚上外出，一定要在十一點以前歸店，否則便要解職。這是“店規”第三十三條規定了的：“自丁卯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前門於晚上十點鐘上鎖，由各店員輪流值班，十一點鐘以後不再開放。如有人在外因此不能進店者，即以不歸號論之”。“不歸號論之”是什麼意思呢？這在“店規”第五十九條中規定得很明白：“不經經理之准許，晚上不歸號者立即解職。”資本家不僅嚴格地規定了店員業餘外出的時間，還限制我們的活動。如“店規”第八十八條這樣寫着：“職員學生私自出外觀電影及其他戲劇者，查出罰洋壹元，以十元賞報告人。”又如第九十一條：“閱報須收市後在樓下閱之，不准將報紙攜至樓上閱看，違者罰洋五元。”這也不准，那也禁止，活動的余地一點也沒有。更荒唐的是資本家連我們的頭髮也要管。如“店規”第十六條規定：“各職員學生頭髮，除修剪平頭及圓頂外，一概剃光，別無他式，以節時間。”因此，不論年長的店員或者年輕的學徒，多數剃和尚頭。也許記憶好的老顧客還能想得起來，從前跨進協大祥的店堂，真象到了和尚廟一樣。資本家常說：“吃協大祥飯，留髮不留薪；留薪不留髮。”意思是，你要在協大祥工作，休想留長髮。每到發薪水那天，資本家叫賬房先看每一個職工的頭髮，如果不符規定，就扣住工資不發，要這個人去剃光了頭或者剃了平頭才准領工資。對學徒更是苛刻，

資本家还要用尺去量学徒的头发，超出一寸者，即要重剃，毫无例外。这种生活，与囚徒有什么两样呢？这里不同的是：一个是戴上了镣铐关在有铁栅的监牢里，一个是不戴镣铐禁闭在沒有铁栅的监狱里而已。

牛马般的生活

解放前，协大祥的资本家常说：“吃协大祥饭要有做过三年救火会工作的身坯。”这就是说，沒有强壮的身体，休想进协大祥工作。那个时候，我們一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整天除了吃饭时间略坐片刻外，再也没有坐着工作的机会，更谈不上休息了。做营业员的必须会同时应付三四个顾客，如果只会接待一个顾客，在资本家看来太无本领了，这样，解雇的危险就很大。因此营业员往往是做了这里，照顾那里，一笔交易还没做完，赶忙接上第二笔，收下款忙着往帐台送，真是一天做到夜，一天跑到夜，一天站到夜。我們理货员和学徒更是紧张，除了理货外，还要协助营业员取货送款。橱窗里的货卖空了，要不断从楼上掬来补足。店中买进的箱装、包装货到了，又得从店门口掬到楼上库房，特别是这些货大多是在开晚饭的时间到店，如果吃饱了饭掬货，既难过又容易出毛病，不吃吧，肚子已饿得空空的，人早又累又饿得沒有力气了。资本家不管我們这些，飽了

要拮，餓着也要拮。而且每拮一次總是八四十四，百把斤不希奇。凡是我們拮布的時候，資本家准是站在帳台上“督戰”。因此，我們不但要拮得多，而且還要跑得快。為什麼呢？因為不這樣，老板就要加上工作不賣力、動作不敏捷等等罪名，就有被剝奪“飯碗”的可能。

那時候，店員不生病還好，一生了病，可就是大難臨頭了。我生過一場傷寒症。在得傷寒症的头幾天，已有熱度，可不敢講出去。為什麼呢？因為“店規”規定請病假要扣工資，而且病假一多，就要解雇。不少人吐了血總是偷偷地抹去血迹，到無法隱瞞時才請假。這種前例太多了，所以我到了飯已吃不下，工作已做不大動時，還硬撐了幾天，撐



凡是我們拮布的時候，資本家准是站在帳台上“督戰”。

到实在不能起床时，才請假延医。当时我的职位是理货員，在店里的地位比营业員低，除了工資比学徒較高外，其他待遇与学徒相等。我們沒有固定的鋪位，睡在店堂里，一副鋪盖早卷夜摊。我生病的时候，連个床鋪也沒有，結果在放置絨布的擱楼上摊了地鋪。后来我病勢一天天加剧起来，才进了新城隍庙对过弄内的一家小医院。住院半个月，由于生病期内工資全部扣除，我再沒有能力繼續治疗，只好回到店里。

又拖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勉强可以起床活动活动了，这时，資本家就来找我說：“祥云，店中规矩你是晓得的，你准备回家休养呢，还是銷假工作？”我生伤寒症后身体特別衰弱，想多休养一个时期，但一想起“職員病假以一个月为限，过期須自行辞职或由本号开缺”的这条店规，心想，我若繼續休养，就意味着丢掉“飯碗”，所以只得硬着头皮工作了。

我的这种遭遇还算是“幸运”的呢，更不幸的是被断送了性命。象比我早几个月进店的袁云甫，工作了半年左右，染上了肺病，无錢就医，只得边吐血、边工作，到了支撑不住时才請假回乡休养。过了近一个月，他病况有了好轉，資本家的催促信也到了，信中写着“店中业务忙碌，希于五天內到店服务，否則尊缺未便久悬，惟有另行他补”等語。袁云甫知道解职后生活将更加困难，只得抱病到店工作。不久

他很快地消瘦下去，几个月后，他瘦得病骨支离，坐立都很困难，不得不再次请假回乡。从此一病不起，不多久便死了。

在党的阳光照耀下

上海终于解放了，毛主席的紅太阳照进了协大祥，照亮了我們职工的眼睛，照亮了我們职工的心。协大祥的象鎖鏈那样的“店員規例”废除了，縛住我們手脚的鍍铐打碎了，无形的鉄柵拔掉了，忍气吞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职业有了保障，梦寐以求的敲不破、砸不碎的金飯碗真正变成了现实。但自解放至公私合营之前，我們在經濟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資本家的剝削，企业的經營管理权还操纵在資本家手中，而我們的劳动成果主要也为資本家所占有，职工的劳保福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公私合营之后，企业的性质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們职工直接参与了企业的經營管理，真正成了商店的主人，生、老、病、死都有了劳保。我在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扁桃腺炎，合营后在組織和同志們的关心下，进医院动手术根除了。两个星期的休养期間，我不仅工資照拿，医药费由国家負担，更使人感动的是得到了多方面的亲切关怀。这种事情在公私合营后，在职工中很多很多，象店中有一个长期患慢性病休养在家的陆金根同志常常感动地說：“象我这种人，要是在旧社会早被資本

家一脚踢出去了。”

在旧社会，我們协大祥职工看书报、看电影都被禁止。大世界游乐场与我們商店只有一窗之隔，但是誰也沒有去过，真是可望而不可及。有两个学徒，有次在业余时间看了一次电影，被资本家发觉后就下令解职。經過再三恳求，被罰了半个月工資，說是对他俩“格外开恩”。解放后，我們可以自由地在业余时间享受各种文娱活动。公私合营后，更加强了职工的业余文化教育，一九五八年，我們創辦了职工业余专业学校，我这个原来只讀过四五年书的人，也讀到了高中。

解放前，资本家在店里普遍行使虛伪的“加三放尺”，可是在量布时又施展欺騙顧客的“飞尺”手段，把放的“收”了回来。解放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资本主义的經營作风逐步得到改造。公私合营之后，銷售一律按国营牌价，彻底革除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經營方法。我們营业员也懂得了做商业工作就是干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营业员要对消費者負責，要做消費者的貼心人。这些年来，我們总是实事求是地介紹商品，为消費者精打細算，節約用料。尤其近几年来，市场上增加了不少化学纤维等新品种，我們就尽可能地向顧客介紹商品的性能、特点、用度和保养方法等，不仅使消費者在选购衣料时滿意，而且在拿到家中做成衣服后也滿意，因此

不少消費者常常書面或口頭表揚我們。如有一位姓胡的顧客在來信中這樣寫着：“你們一尺一寸地為顧客精打細算，使我体会到，只有在新社會，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才出現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營業員。”（丁斌曾插圖）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

磨豆腐的苦和甜

閩北豆制筋粉加工廠工人 繆金龍

旧社会里有句俗話：“世上有三苦，打鉄、撐船、磨豆腐。”这里我就来談談磨豆腐的苦吧！

一九一六年我十二岁时，家乡扬州遭了水灾，我們无法生活下去，母亲含泪将不满一周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接着，祖母生病死了，母亲万不得已，把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田地和一間草房半卖半送地給了地主，料理了祖母的后事，从此我家便一无所有，母子两人只得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寻找父亲。当时我父亲在上海药水弄一家“方正昌”豆腐店做工，所得的一点微薄工資只够自己糊口，哪里能养活我們母子两人呢！正当我們一家愁眉苦臉的时候，豆腐店老板却笑嘻嘻地“安慰”我父亲說：“既然乡下活不下去，就住在店里吧。”就这样，我母亲在店里当娘姨；我做学徒，只吃口飯沒有工資。老板對我們的“照顾”，却給階級兄弟带来了灾难，第二天，老板就以生意清淡为名，将店里另一个老师傅回掉了。

我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起来就要摆摊卖豆腐，卖完豆腐回来要洗豆腐箱套和豆腐布等。匆匆吞完早餐后，就要放驴子去吃草，同时还要割几百斤草料回来给驴子作饲料。中饭后，我要跟在驴子身后推磨磨豆浆。老板规定每日要磨二百多斤黄豆的豆浆。但当驴子磨到三四十斤后，老板怕驴子过度吃力，就把它歇下来，要我一个人推磨。我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哪里推得动这么大的磨子呢？我母亲怕我损伤身体，她常常偷偷地帮我一起推。但是即使母子两人推，还是推得上气不接下气。二百多斤黄豆磨出的豆浆还要煮熟，老板尽拿一些垃圾当燃料，火烧不大旺，我不得不一连几小时不断地拉风箱，拉得两臂痠麻不堪。每天，我做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浑身骨头就痛得象要脱落下来一样，坐也痠痛，立也痠痛。但这时，我还要服侍在吃酒赌钱的老板，给他们倒茶、送水、办夜点心，轮到睡觉，已近半夜。那时，我一天做十八九个小时工作，做了之后，还没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我父母是用做豆腐干的横板搭床睡觉，早上拆，晚上搭，盖的是一条已用了几十年的破被；而我在天冷时只好睡在灶头边的垃圾上面，利用灶头里的余热取暖，天热时就睡在门口的马路旁边。我经常睡眠不足，疲劳过度。有一次，我在堆放豆腐时一不留心，滑了一交（不论严寒酷暑，我总是赤着脚工作，地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全是潮湿的，所以非常滑），滚烫的豆腐倒在我身上，烫伤了胸口。老板看

到我倒翻了豆腐，竟扣掉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抵偿。

一个月做下来，就可以看出老板当初的“善意”来了。我们三人每人每天平均劳动十六到十七小时，逢年过节，我们就要连续五、六个晚上不能好好睡觉。而老板自从我母亲和我进店以后，他不但比过去少开销一个老师傅的工资，而且每天还多磨四十斤黄豆，这真是又省开销又多赚钱，同时，他还有一个等于替他白做家务的老妈子。

好容易过了三年，照理我应该满师了，岂知老板这时又很“诚恳”地对我父亲讲：“这个小团工作倒蛮好，就是本事没有学到家。如果现在满师出去工作，要坍我师傅的面子，败坏我店的名誉。依我之见，还是再学三年。”他又利诱说：“如果繆金龙在店里继续学三年，可以学会技术，每月还可拿月规钱，每年可做一套衣服。”我父亲在他的威胁利诱下，只好答应。老板说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在以后的三年中，我依然一点也没有拿到什么工资。

六年过去了，应该说，老板再没有理由不让我做老师傅了。可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老板先以满师为名要我父亲办酒请客，父亲只好借债办酒。几天后，老板对我说：“现在你有了本领，可以出去‘闯闯’市面，你自己去找寻工作吧。”在那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里，失业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哪里能找到工作呢！我只好今天到码头上做做小工，明天去拉拉黄包车，后天又去当小贩买卖青菜萝卜。混了三个月，

将近年节,老板却“主动”到我家里(这时父亲积了一些血汗钱和借了一些债在秣陵路一家皮球厂旁边搭了一间还不到一个人高的草棚),很“客气”地问我:“近来生意好吗?”我回答说:“工作没有找到,只好东混一天,西过一天。”他说:“既然没有工作,日子难过,还是到我店里帮几天忙。”我想也好,赚几个钱也可过一个年。谁知到大年夜向他拿工资时,老板怒气冲天地说:“帮忙几天,还拿什么工资?何况你现在没有工作,给你吃一点饭已算蛮好了。如果要找工作,必须由我做师傅的介绍,并且还得看机会。现在你还是在我店里做做吧!”工作找不到,只得在他店里混口饭吃。我又白白地替他干了两年。

二十一岁那年,在邻居的帮助下,我同一个人从乡下逃难到上海来的姑娘成了家。可是好景不长,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得了病。家里糊口都有困难,哪里有錢請医求治,只好向老板求借一点錢,不料老板一口拒絕。我要老板把欠我父亲的工资付给我,老板拍桌大罵道:“我买黄豆都没有錢,哪里还有鈔票来付工资?小囡生病,有啥大惊小怪的,要死就死好了。你年紀輕輕,今后还可以生的。”孩子病死了。我妻子也抑郁成疾,不到一星期,也死了。不久,我父母也因积劳成病,相继去世。从此我一家五口,只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而老板呢?自从我和母亲进店以后的八年中,他发了财,还在昆山买了田地,剝削农民。

解放后，磨豆腐这一行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工人不仅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生活得到了保障，而且劳动条件也大大改善了。过去磨豆浆，一副近二百斤重的磨子，完全靠手推或手拉，一天推八个小时，只能磨二百多斤黄豆；现在，我们用了电动机，开关一开，工人只要在机器旁边照顾照顾，一天八小时就能磨一千四百多斤。过去煮浆完全用手拉风箱，一小时只能煮五百多斤豆浆；现在利用蒸汽煮浆，只要将蒸汽龙头一开，就可在四分钟内将五百斤豆浆煮熟。过去将煮熟的豆浆拿到豆腐花缸里点成豆腐花，要用双手端着一百多斤重一桶的豆浆倒在花缸里；现在呢，只要龙头一开，豆浆自动地从煮浆间的蒸桶里通过管子流入花缸。除了包豆腐干等活还需用手工一勺勺地把豆腐花舀出来，以及机器上还需一些手工辅助劳动外，豆腐业中长期留下来的所有的笨重手工操作都已半机械化、机械化了。磨豆腐的工人不但已从剥削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我自己，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五十岁那年又成了家。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望望将来，我这个年已花甲的老头子真是越活越年轻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还要在豆腐店里努力地干一番呢！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万人坑”里逃生

淮南煤矿退休工人 赵扬全

我是淮南煤矿的老工人，如今退休在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在退休前，我对儿子媳妇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哪里还有咱这一家？我早就死在那块田坎子上了。”我讲起过去，全家人听着听着，都哭了起来。

我老家在山东，后来逃荒到安徽蒙城县。在蒙城，我在地主家做长工，不久被地主一脚踢开了。一天夜里，我们一家人饿着肚子，躺倒在一家旅馆的屋檐下。这时，忽然走过来一个穿西装的人，瞅了我一阵，对我说：“淮南煤矿在招工。那里有吃有住，上井坐电梯，下井四季不用穿棉衣，活可轻啦！走，跟我去干工！”我信以为真，就跟他来到淮南煤矿。

一到矿上，我们就象犯人似的，被矿警押到窑户村。这个地方有几排东倒西歪、四面漏风、屋顶露着天的破草房。我们同来的几十个人，就在这些破草房里，在地上铺了几条破席子睡觉。当天晚上，大家饿了一夜；第二天，刚刚吃过又黑又霉的豆饼饭，把头的狗腿子来了，厉声厉气地说：“饭

也吃过了，明天统统下井干活！”

天还没亮，工头提着棍子来了，他又推又拉地把我們帶到矿门口，一个矿警拿着枪挨个地搜了身，才准我們进矿。这天，我被派去推车。当我放第四车煤时，从“放煤眼”里窜出一个黑呼呼的东西。我急忙伸手一拖，一看，是个血肉模糊的死人，吓得我腿也軟了。我正心里发慌，忽然灯光一闪，走过来一个监工，他见我呆着，抡起皮鞭就打。我說：“我推了三车了，这车煤里放出一个人，我害怕……”我話还没說完，那个騙我来淮南煤矿的家伙，走过来举起手打了我两个耳光，还罵道：“穷鬼，混蛋，我看你还嘴硬。你害怕就不要下井，怕死就别干了。”当时我就問他在蒙城怎么說的。他獠笑了一声，又拿起棍子朝我头上打下来。我咬着牙，忍着痛，把第四车煤推走。

此后，我被派到西小井老十三槽干活。一天，里边突然着火了，滿巷道都是烟火，无路可逃。当时我的衣服全着了火，脊梁也被烧伤了。我躺着不能动弹，接着就昏过去了。后来，我就被当作死人拖进了“万人坑”。我老婆聞訊，哭得死去活来，赶到“万人坑”要求送尸的人让她去看尸体。她一面哭，一面扒，好不容易从尸堆里把我扒了出来。她哭着摸摸我的心口，发觉还有点热气，就連忙对那个送尸的人說：“俺小孩的爹沒死，还有口气呢！”她急忙請人把我抬回家。那时家里只剩一碗米，我老婆分几次熬湯給我喝，我才慢慢地苏

醒过来。这次我真是死里逃生！事后才知道，资本家听到井下发火，怕烧了矿井，就不顾我们工人生命，封闭了火区，有好几个没有烧死的工人，被活活封在里面。这次烧伤烧死被扔进“万人坑”的就有七十多人。

提起“万人坑”，我们矿工都有着满腔仇恨和愤怒。一九四二年，矿上瘟疫流行。得了这病，浑身发高烧，不断抽筋，最后淌一滩血便死去。那时日本侵略军到处查收病人，如果被查到，他们就把病人抬到“万人坑”去活埋。一个叫张志成的工友，被抬到“万人坑”，在那里躺了三天三夜。野狗当他是死人，直往他身上咬，他痛得尖叫一声，从昏迷中惊醒过来，爬到水沟边，喝了几口泥浆水，总算挣扎着逃出了“万人坑”。那年从河南来的许多人，绝大多数得了病，不论死没死，全被丢进了“万人坑”。

我们活着的不仅天天担心会被丢进“万人坑”里，而且生活苦得可怕。我孩子十五六岁还光着屁股。我和老婆也只能合穿一条裤子，我下井，她就沒有裤子穿，只好睡在家里不出门。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南解放了，我才真正逃出了“万人坑”，获得了新生。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矿工的生活。解放后，我先后到外地疗养了十次。工作上有点成绩，就受到领导的表扬，大家还评选我为先进生产者，一九六一年参加了矿区先进生产者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这些幸福和光荣,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啊!现在我已退休在家,工会每月把退休养老金送到我家里。我时常想,自己身体还好,还可做做轻活,所以我常常要到矿上走走,拣拣废铜烂铁,给矿上出出主意。有人讲我“有福不会享”,我自己心里明白,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干点活,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